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09期(民國109年9月),91-13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自立與依附：以中共統戰對象李劼人為例*

王超然**

摘 要

本文以李劼人為例，探討 1949 年以後中共如何統戰資產階級，推行新的政治運作模式，以及其間各階段的變化。1949 年建政後，中共的統戰政策有了新的變化。中共與資產階級的合作，由過去共同對抗國民黨，轉變成形式上為聯合政權模式，實質上為中共專政的運作模式。就中共而言，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為其敵人，但在現實上又必須將資產階級代表納入體制之內，以穩固政權，順利轉型成社會主義國家。所以，讓統戰對象聽從中共的領導便成為首要目標。至於被視為資產階級代表的社會菁英，對中共的意識形態認知不足，仍認為自己能夠在保持一定程度自立的狀態下，進入體制內工作，與中共友好合作。中共在建國後的統戰政策，在既團結又鬥爭的原則下，一方面藉由各種物質待遇、政治特權等，讓統戰對象得享優遇；另一方面則試圖以各項政治運動、思想教育，逐漸消除他們的自立性，將他們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令他們成為體制的依附者。李劼人的際遇，是中共施行新政治運作模式下，作為資產階級統戰對象的具體縮影。

關鍵詞：中共、統戰、李劼人、成都、四川

* 收稿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0 年 2 月 24 日。
**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　言

所謂統戰對象，或中共慣用的民主黨派、黨外民主人士，意指中共基於統戰政策在政治上聯合的對象，大體上也等同於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本文以李劼人（1891-1962）爲例，探討中共在 1949 年後如何將統戰對象納入國家體制，發展出一個新的政治運作模式，以及這個模式至文革前夕各階段的具體變化。

李劼人是四川成都人，爲小說家與翻譯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及《大波》三部長篇小說，於 1935-1937 年間陸續問世，日後也成爲研究地方文化的重要參考資料。此外，李氏也是抗戰時期大後方重要機械製紙廠嘉樂紙廠的負責人，與地方軍政人物關係密切，並長期援助成都的中共地下黨人活動；[1]在中共建國後又擔任成都市副市長，爲典型的地方菁英。根據中共的階級觀點，李劼人爲實業家，屬於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又是統戰對象。

1949 年堪稱中共統戰政策變化的重要分水嶺。[2]中共成爲執政黨，並以聯合政府架構，將爲數眾多的社會各界代表人物納入政府各級體制之內。中共在本質上視資產階級爲階級敵人，但建政初期，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社會上依舊具有影響力，所以基於政治現實考量聯合他們組成政府。中共統戰政策的新課題，即是如何在聯合政府的新架構下，讓這些統戰對象既可參與政務，又能配合推行黨的政策，發揮實際政治效用；至於具體可行的做法爲何，也需要摸索和嘗試。及至 1953 年，中共開始推動社會主義改造，將私人資本改爲公有制，欲消滅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代表在政治上也失去作用。儘管如此，中共仍將他們留在體制內，但統戰政策的重點則隨之改變。中共的統戰政策如何有效落實

1　相關探討，可參閱付金艷，《實業家李劼人檔案揭密》（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

2　關於中共統戰政策在 1921-1949 年間的發展情況與具體變化，請參考 Lyman P. Van Slyke,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Tets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於地方社會，後來又是如何處置留在體制內的統戰對象，而其間又歷經哪些變化，值得深入探討。

中共因應情勢變化，試圖調整實際政治運作方式，而另一方面，被統戰的對象亦處於摸索與適應狀態。1949 年以前，大多數人對中共獨特的政治文化其實很陌生，無法掌握「階級」、「鬥爭」等詞彙的實際意義。[3]中共強調政治領導一切，一切為政治服務，與社會菁英慣偏好擁有自立空間、不受政治干擾的習性相互衝突。1949 年以後，他們作為統戰對象進入中共體制，以為仍然可以保有一定的獨立性，沒料到實際卻遠不如預期。在這新政治模式的轉變過程中，統戰對象如何生存，心態上如何調適，是否真的完全成為中共的傀儡，亦頗值得留意。

學界以往探討中共統戰課題，大多關注在高層政治、政策內容變化，與全國性的知名黨外人士，甚少注意統戰政策在地方層級的具體運作狀況，也鮮少探討地方統戰人士個案。[4]但是，地方菁英對中共革命奪權、建國後穩定各地局勢同樣具有重要性。在這方面，李劼人的案例可謂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而以往關於李劼人的研究，大多以其民國時期的文學創作、文化史、社會史為主，論到將他視為政治人物，從政治史的角度來觀察探討，則有待開發。[5]目前與本文最相關的研究者為雷兵。他討論李劼人 1949 年後由作家轉變為成都市副市長的心態適應與自我定位，可惜並未進一步分析中共的統戰政策與各時期變化，對李劼人的政治活動及其日常生活的影響，且著重於 1957 年反右運動以前，而未探討其後發展。李劼人與其親友留下了豐富的書信、回憶文章、

---

3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

4 相關作品如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余敏玲，〈從無知到有感：程硯秋與中國共產黨〉，《新史學》，卷 27 期 3（2016 年 9 月），頁 123-176；胡治安，《統戰秘辛：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修訂版）》（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15）；楊奎松，〈建國前後中共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演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冊 1，頁 460-505。

5 雷兵，〈李劼人研究的現狀與問題〉，《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1 期，頁 54-57；蔣林欣、張歎鳳，〈「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英語世界的李劼人研究成果與現象〉，《中外文化與文論》，2013 年第 3 期，頁 123-139。

日記、年譜；此外，國民政府與中共的檔案資料也記錄了他從事實業、政治等相關活動。[6]本文以上述材料爲基礎，貼近考察中共掌政前後與李劼人的互動，從李劼人的政治等級、薪俸與物資配給，以及各項生活待遇的狀況，探討統戰對象在中共體制內的生活處境，以及中共新政治模式在地方上運作的實際情況與意義，同時並以此作爲觀察中共建國前後如何經營地方的一個參照點。

二、1949 年以前的李劼人

（一）浮沉於地方社會的文人

李劼人在 1891 年 6 月 20 日生於成都，父親於 1906 年過世，與母親寄居外婆家。因親戚資助，李氏在 1908 年得以入四川高等學堂附屬中學，同學有曾琦、王光祈、魏時珍、郭沫若等著名人物。[7]

1912 年中學畢業，李劼人輟學在家。兩年後，因舅父楊碩愚爲縣知事，得任縣府科長，未滿兩年因楊氏離任而去職。任職期間目睹官場醜惡，決定不再涉足仕途。[8]李氏離職後開始從事文學創作，作品獲得好評與矚目，受邀進入報界成爲報刊主筆。他於 1919 年擔任《川報》總編輯，找了在京、滬的同學王光祈、曾琦，以及本地的吳虞等新派人士，發表文章大力宣揚五四運動，鼓吹新文化運動。[9]此外，李劼人也由王光祈介紹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並在成

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經濟部檔案》中的〈嘉樂製紙廠公司〉，內容包含股東名冊、會議紀錄，可藉以分析李劼人經營實業的政商關係。另外，雷兵將一般人士無法查閱的檔案資料，如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中共成都市委統戰部，有關李劼人的政治評鑑報告，與他的各種發言紀錄，整理成「李劼人任市長期間行事資料編年」，作爲附錄收在其 2004 年的博士論文，〈「改行的作家」：市長李劼人角色認同的困窘，1950-1962〉（成都：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論文，2004）。筆者探討 1950 年後政治對李劼人的影響，許多檔案資料來自於此。爲免文繁，下文如有轉引，簡稱爲「編年」。

7 李士文，《李劼人的生平和創作》（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5-9。

8 李劼人，《李劼人全集》（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1），卷 1，頁 3-4。

9 王綠萍編著，《四川報刊五十年集成（1897-1949）》（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1），頁 69；張義奇，〈五四時期成都的域外專電——周太玄、王光祈與李劼人在 1919 年〉，收入成都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李劼人研究學會編（下略編者），《李劼人研究：2011》（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1），頁 307-311。

都設立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與創辦《星期日》週刊，找吳虞幫忙編務、寫稿，發行量一期最多至五千份，引領一時風潮。[10]

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李璜當時由巴黎寫信給李劼人，請他找人參加勤工儉學，至法國幫忙編輯刊物。李氏決定抓住機遇，前往法國留學。[11]留法期間，少年中國學會旅歐會員因選擇救國路線出現分歧，逐漸分爲左右陣營。趙世炎與張申府、周恩來等人於 1921 年創辦共產主義組織，李璜、曾琦在 1923 年成立中國青年黨，李劼人則選擇保持中立，不加入任何陣營。但青年黨人如魏時珍、何魯之爲他的同鄉親友，又在生活上獲得他們的實質幫助。例如，李劼人在法國的日常開銷，大多依靠國內匯來的稿費，這筆款項即是由時任中華書局編譯所新書部主任、後又擔任青年黨官方刊物《醒獅周報》負責人的左舜生所張羅，李劼人翻譯的小說也是在中華書局發行。[12]雙方的關係相當密切，所以即便李劼人沒有公開加入青年黨，外人也易於把他們聯想爲同一陣營。

1925 年 7 月，少年中國學會因內部政治路線之爭越演越烈，瀕臨瓦解，爲了調查成員的政治態度與確認學會未來走向，該會寄發調查表徵詢會員意見。李劼人在調查表「抱何種主義？」一項，寫下：「概括言之，可以說是『國家主義』，分析言之，是本於『愛鄉』的感情，推而及於『國』；凡有害於『國』與『鄉』的惡勢力，不論在內在外，一概極端反對到底。」李氏基於愛鄉愛國觀點而認同「國家主義」，但與李璜、毛澤東的認知不同。毛澤東在調查表強調「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李璜則表示「以國家主義解決一切」；毛氏認爲既然會員間政治路線互相衝突，學會「實無存在之必要，主張宣布解散」，李璜則說「澄清共產派後積極進行」。相較李璜、毛澤東展現黨同伐異立場，李劼人認爲：「本會是社會的學術集合團體，仍認以本

10 李劼人，《李劼人選集》（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卷 5，頁 9；冉雲飛，〈吳虞與李劼人〉，成都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李劼人研究學會編（下略編者），《李劼人研究：2007》（成都：巴蜀書社，2008），頁 302-306。

11 李劼人，《李劼人選集》，卷 5，頁 16。1919 年歐戰結束，前往法國進行勤工儉學的人開始分批出發，至 1921 年 1 月爲最高峰。川籍學生在此時期人數是 472 人，爲全國之冠，鮮于浩、田永秀，《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中的四川青年》（成都：巴蜀書社，2006），頁 10-15。

12 李劼人，《李劼人選集》，卷 5，頁 22；李劼人，《李劼人全集》，卷 1，頁 6。

會的行爲思想改善庸眾的觀感，使向於進步爲主旨。」亦即，李氏將學會定位爲「學術團體」，非「政治團體」，希望包容各方進步知識分子，毛、李二人則視學會爲政治組織，只能爲單一主義政團掌握。[13]即便青年黨與共產黨彼此對立，李劼人沒將左派人士視爲敵人，但也沒料到他與青年黨人的密切關係，日後會成爲中共政治審查中的歷史「汙點」。

1924 年 6 月，李劼人離法返回當時楊森主政的成都。楊森想招攬李氏，但李氏因對他觀感不佳而回絕，反而回《川報》再任主筆。李氏常常嘲諷時政，讓當局很不滿。不久，楊森藉故派兵查封《川報》，並監禁李劼人，幸好受楊森器重的舊識盧作孚替他說情，才得以獲釋。[14]李氏歷經此劫，想要另尋出路。他認爲四川由於缺乏機械造紙廠，紙張大多仰賴進口，決定創辦紙廠。他寫信給在法國的何魯之，請他找尋願意共同創業的專業人才。他在信中強調，此舉「關於四川的實業，關於我將來在社會活動的初基」，人選要「不妄想作官，不妄想依附軍人」，不要「仰軍人鼻息而作惡於社會」。由此可見，他要藉實業在軍閥社會自立，落實回饋鄉里並振興國家的理念。[15]

李劼人找了在法國學造紙技術的樂山人王懷仲一同創業。爲了籌措資金，他們先從成都的親友著手，但成效不大，而自己手頭也不寬裕，遭遇瓶頸。王懷仲試著與在樂山的實業鉅子陳開沚接洽，[16]獲得良好回應。他們遂決定找樂山的工商人士合作，先後拜訪黃遠謀、施步階（樂山商會會長），並與陳開沚進一步商談。陳氏表示有意願投資，並擔任董事長，將紙廠命名爲嘉樂，又拉了劉文輝軍部的財政主管張榮芳投資，張氏以親弟張壽林名義出面。因此，陳開沚、張榮芳成爲主要股東。[17]嘉樂紙廠 1927 年正式營運，陳開沚之子陳光玉擔任經理，李氏爲協理，王懷仲任廠長。紙廠因機械老舊、技術低落，以致

13 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一）》（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 508-529。
14 李劼人，《李劼人選集》，卷 5，頁 631-632。
15 李劼人，《李劼人全集》（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1），卷 10，頁 12-13。
16 陳開沚（1855-1926），四川三台縣人，字宛溪。陳氏爲清末秀才，以機械大規模製造生絲致富，爲民國時期四川著名實業家，參見陳綱祖，〈陳開沚與裨農絲廠〉，《三台文史資料選輯》，輯 1（1984 年 9 月），頁 37-41；李劼人，《李劼人全集》，卷 1，頁 8。
17 李劼人，《李劼人全集》（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1），卷 7，頁 308-310。

產品質量低劣，故獲利不佳。陳開泚已於 1926 年過世，張榮芳又無意增資，李劼人無法實踐初衷，反倒負債累累。

1925 年 9 月，劉湘取代楊森，改派張瀾接任成都大學校長。張氏上任後，大學招募新派人士，李劼人受聘爲教授，李璜、魏時珍等也相繼至成都大學任教。李璜、魏時珍趁勢發展青年黨勢力，一方面培養學生黨員，又刻意結交地方軍人，藉此在軍隊與基層發展勢力。[18]魏時珍的同鄉湯萬宇，爲田頌堯部 29 軍副軍長孫震的參謀長。[19]魏氏透過湯氏與孫震結交，又將李劼人介紹給湯、孫二人認識，並建立良好情誼。1930 年 4 月，李氏因看不慣校內舊派學人作風，學生又不服管教，辭去了教職。[20]他爲謀生而借貸開餐館，一時成爲地方話題。1931 年底，李氏之子被軍人綁票，靠社會人士居中協調，付贖金才了事。李氏債務加重，餐館也被迫停業，生活非常不如意。[21]孫震本想聘李氏爲顧問，以解決其生活問題，被他婉拒。之後，孫氏投資紙廠 2,000 元，以表達幫助友人的情誼。[22]

李劼人拒絕楊森的招募，卻與孫震結交，兩者看似矛盾，但卻反映出李氏與政治人物接觸，有其堅持，亦有世故的一面。他的學生王介平，爲一左派進步青年，在北平念清華大學，孫震多次欲資助他學費，王氏基於理念而拒絕，李氏爲此寫信勸他暫且接受，等將來有機會再還人情即可。其後，孫震希望與王氏見面，李氏怕學生回絕，寫信勸王氏「稍稍遷就」，強調「此非教足下奔

18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增訂本）》（香港：明報月刊社，1982），上卷，頁 220-229。

19 劉湘、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爲 1930 年代四川地方軍人中勢力最大者。省會成都則由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三人共治，並成立三軍駐成都聯合辦事處負責相關事務。參見吳晉航、鄧漢祥、何北衡，〈四川軍閥的防區制派系和長期混戰〉，收入四川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集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卷 1，頁 511-535。

20 王東杰，《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 66-67。

21 李劼人，《李劼人選集》，卷 5，頁 641。

22 付金艷，《實業家李劼人檔案揭密》，頁 252-253。付氏認爲孫震投資點爲 1937 年，但楊繼珊 1934 年寫的調查書，已記載孫震入股 2,000 元。筆者據此判斷孫震投資紙廠在 1934 年前，而非 1937 年。參見楊繼珊，〈調查嘉樂紙廠報告書〉，《四川善後督辦公署土產改進委員會月刊》，卷 1 期 2（1934 年 8 月），頁 17。

走權門也，亦猶釋氏之不得不找檀那耳！」[23]他用「釋氏」也要找施主，說明正視現實狀況，方是實踐理念的穩妥之道。李氏不願依附軍人，又想尋求自立，而選擇可以接受的「檀那」，以此建立社會地位，等有機會再回報孫震，足見其處理人情世故之原則。

1929 年世界經濟大恐慌發生，洋紙輸入四川少且貴，日紙物美價廉又大量傾銷，成都報館普遍改用日貨，嘉樂紙因此滯銷。出乎意外的是，九一八事變引發全國抵制日貨風潮。成都各報館因拒用日紙，嘉樂紙一時之間在市場上變得熱門。有了穩定客源，紙廠經營情況逐漸好轉。[24]1932 年冬，劉湘爲統一四川，出兵攻打劉文輝。戰爭期間，劉湘希望能與田頌堯聯合。因爲孫震爲田頌堯副手，李劼人的好友盧作孚則是劉湘親信，於是劉湘便找與雙方陣營都有關係的李劼人爲說客。[25]盧作孚負責李氏擔任代表的各項花費，事後又安排他出任民生機械修理廠廠長一職。劉湘一統四川後，在 1934 年 2 月即對外宣示要促進地方實業發展，更預先成立土產改進委員會，將紙業列爲優先發展產業之一。1935 年 3 月底，蔣中正下令由孫震取代田頌堯接任軍長，孫震地位水漲船高。[26]雖然孫震投入紙廠的資金不多，但其政治分量已足以涉足紙廠事務。不久，李劼人因爲與股東理念不合，於 1935 年 6 月辭職回成都。[27]李劼人原本打算日後以寫小說維生，但是大環境的變化，又將他拉回實業界，讓他成爲抗戰時期活躍於地方社會的工商業者。盧作孚於 1935 年 10 月接掌省府建設廳後，即因李劼人之故，多次以省府資源支持嘉樂紙廠。[28]李劼人原本在紙廠發言權不大，僅擔任過協理，在地股東卻於 1935 年 10 月推舉他爲董事，主要便是因他是盧作孚好友，同時又與孫震交往密切，可作爲連結地方政治新貴的樞紐。

23　李劼人研究學會編，《李劼人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頁 183-187。

24　何崧齡，〈嘉樂紙廠之過去與將來〉，《四川經濟月刊》，卷 1 期 6（1934 年 6 月），頁 6-9。

25　盧作孚 1925 年在渝創辦民生公司，獲劉湘全力扶持，而成爲四川商界舉足輕重人物。劉航琛口述，章君穀筆記，《戎幕半生》（臺北：川康渝文物館，1983），頁 174-178。

26　孫震，《楙園隨筆》（臺北：川康渝文物館，1983），頁 205-206。

27　曾智中，〈實業家李劼人史料一束〉，收入《蜀學》（成都：巴蜀書社，2014），輯 8，頁 273-290。

28　付金艷，《實業家李劼人檔案揭密》，頁 249-250。

1937 年抗戰爆發，紙廠營運意外地急速成長。中國的機械造紙廠在抗戰前大多集中於上海、江浙一帶，戰爭爆發阻斷物資流通管道，沿海紙廠亦不及搬遷，嘉樂紙廠遂成爲後方唯一的機械造紙廠。此外，中央軍政機關、各級文教機構與人口大量遷入四川，使得紙張需求量倍增，嘉樂紙儘管品質欠佳，各方依舊爭相搶用。重慶國府爲發展大後方工業，由經濟部提供民間工商業人士優惠貸款，嘉樂紙廠因而獲得資金，可以更新造紙設備。1940 年，紙廠年產量接近 550 公噸，1941 年又合併重慶的四川造紙廠，將產量提高至 1,000 公噸，銷售範圍遍及西南與西北，成爲西南各地中、小學教科書印製與大後方新聞紙張的主要供應商，李劼人一變成爲成都著名的工商鉅子。[29]

李劼人與孫震爲牢牢掌握紙廠，不受樂山本地勢力牽制，進行了一連串的增資行動。孫震從 1938 年後，除個人外，又陸續以其子孫靜山及孫家創辦的樹德中學名義投資紙廠，而成爲紙廠最大的股東。此外，孫震又將四川地方軍政名流，如昔日長官田頌堯、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部屬湯萬宇等，拉入股東會。[30]李劼人也邀其好友，如李璜、魏時珍、何魯之、張頤（李璜的姊夫）等入股，其中張、魏兩人更先後成爲董事會董事。此外，李劼人又聘李璜爲紙廠有給職顧問。[31]李劼人與孫震主導的嘉樂紙廠，於是成爲青年黨要人與地方軍政人物的匯集處。

（二）中共地下黨活動的支持者

李劼人功成名就後，開始實踐關懷鄉土與國家的理念，具體措施就是在 1940 年以紙廠經費設立文化事業補助費。凡經其同意，任何文化團體或個人即可獲得補助，可見他擁有極大的主導權。[32]1946 年，李劼人撥款 3,000 萬成立文化事業補助基金，明訂各個常態補助的文教團體每年的撥款額度，以及各

29 付金艷，《實業家李劼人檔案揭密》，頁 152-187。

30 〈嘉樂製紙廠公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經濟部檔案》，館藏號 18-23-01-17-08-002。

31 付金艷，《實業家李劼人檔案揭密》，頁 258-267。

32 曹治煒，〈漫說李劼人和嘉樂紙廠〉，收入《李劼人研究：2011》，頁 406-407。

種臨時經費補助，而受益者大半也與他關係密切，特別是孫震興辦的樹德中學，魏時珍創立的敬業中學、川康農工學院，以及中共地下黨主導的文協成都分會。[33]

李劼人的文化事業補助費，實際上具有相當的政治意涵。由於李璜、魏時珍等爲四川人，抗戰時期又將中央黨部設於成都，基於人際關係與地利優勢，川康成爲青年黨極力耕耘的據點，各地的中學校長、縣長不乏青年黨黨員，勢力遍及全川。青年黨在地方發展黨務的策略是與地方實力派結盟，以及透過學校吸收青年學子爲黨員，魏時珍主持的敬業中學以及川康農工學院，皆與青年黨關係緊密。[34]國民黨的黨政軍聯席會報秘書處在 1947 年 6 月的《青年黨在四川動態》專報，即指出川康農工學院的師生幾乎全是青年黨員。[35]李劼人在 1940 年代經濟惡化時期，定期補助魏時珍主持的學校，使其得以持續經營，也等於間接支持青年黨的政治事業。

青年黨人與李劼人的緊密互動是建立在親友同鄉情誼之上，中共則依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運用民族主義情感一步步建立彼此的關係。國民黨在抗戰前對日採取妥協政策，對此李氏相當不滿。九一八事變後，李氏在 1932 年 6 月 9 日寫信給學生王介平，信中直言：「中國事何必說，三十年來無一英傑之士，國民黨早已亡於軍人，而汪先生始終說黨治，不亦大可悲乎！」他甚至主張不如「亡國」，因「身體力行之者，乃當國之國民黨也」，[36]字裡行間毫不掩飾對國民黨的失望。他早年曾宣示，對「有害於『國』與『鄉』的惡勢力」抱持「極端反對到底」的立場，所以將國民黨視爲亡國之黨也不令人意外。正因如此，李劼人成爲中共地下黨人重要的統戰對象。

中共地下黨人宣揚一致對外抗戰的進步姿態，透過人際網絡接近李劼人。中共地下黨人張秀熟爲李劼人舊識，是對李氏進行統戰的關鍵人物。張秀熟在

33 付金豔，《實業家李劼人檔案揭密》，頁 188-218。
34 付金艷，《實業家李劼人檔案揭密》，頁 258。
3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青年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頁 201。
36 李劼人，《李劼人全集》，卷 10，頁 27。

1925年加入中共，1928年被捕入獄，至1936年獲釋，出獄後與李劼人重新聯繫。上海左聯組織部長，川籍中共黨員周文在1937年10月返回成都，聯合張秀熟等人，在文藝界組織宣傳與統戰陣地。周文先成立成都文化界救亡協會，李劼人與張秀熟擔任執行委員，爲李氏參與中共外圍組織之始。中共黨員作家沙汀在11月返回成都，成爲周文的幫手。周、沙二人爲整合成都藝文界，多次舉辦聯誼活動，李劼人經常參與，作家陳翔鶴因此與李氏熟識，其後陳翔鶴也被中共吸收成爲黨員。周恩來爲統戰全國文藝人士，於1938年3月創辦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1939年1月設立成都分會，由周文、李劼人、陳翔鶴等擔任理事，發行會刊《筆陣》，成爲中共地下黨人在大後方的活動據點。周文在1939年前往延安之後，文協成都分會改由陳翔鶴主導。

李劼人因重心在經營紙廠，平常不過問會務，向來抱持「你們作了就是，我沒有不同意的」態度，對內支持陳翔鶴各項決定，並協助壓制會內不同意見，對外則公開宣揚相關理念。[37]此外，李劼人還提供物資、金錢讓團體持續運作。例如，李劼人提供嘉樂紙廠成都辦事處作爲協會固定會址，指派公司秘書謝揚青協助處理會務，經常免費供應紙張以出版《筆陣》，並以文化事業補助費長期資助分會活動。文藝界人士在戰時生活困難，李劼人也不時資助貧病或隱蔽鄉間的左派文人。凡此種種行爲，讓中共留下深刻印象。[38]

然而，抗戰結束後，李劼人反倒面臨經濟與政治的雙重危機。由於國府在戰後遷回南京，四川不再是政經中心，紙業需求量下降，市場迅速萎縮。加上外地紙張重新輸入四川，抗戰時設立的公、民營紙廠營運也已上軌道。市場規模縮小之際，同業競爭反而激劇，紙廠經營陷入危機。[39]國共內戰爆發後，大環境更加惡化，嘉樂紙缺乏銷路，生產成本與日常費用又因通貨膨脹嚴重暴增，加上缺乏大量資金支持，陷入五窮六絕之境。至1949年1月，李劼人決

37 陳翔鶴，〈李劼人同志二三事〉，《陳翔鶴選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頁409。

38 謝揚青，〈李劼人先生與「文抗—文協」成都分會片斷〉，收入《李劼人研究：2007》，頁126-130；付金豔，《實業家李劼人檔案揭密》，頁223-228。

39 李劼人，《李劼人全集》，卷10，頁58。

定讓紙廠停產。[40]對李劼人而言，嘉樂紙廠與其個人榮枯密不可分，停產幾乎等於失去生命。故此，他對國民黨當局相當失望。

此外，文協成都分會從 1945 年起，將宣傳主軸由抗戰救國轉爲反獨裁爭民主，李劼人也隨之應和。在 1945 年五四前夕，中共串連數十個成都文化團體，發表反國民黨專政宣言，陳翔鶴以分會名義參與，李劼人也掛名其中。1946 年 7 月，李公樸、聞一多先後遭暗殺，引發各界對國府的不滿。李劼人於 8 月 1 日寫信給謝揚青，要他提醒陳翔鶴盡快對此回應，又擬了輓聯一對，內有「自由應該爭，再流血應該爭」，可見其激憤。之後，陳翔鶴又找李劼人，商討以分會名義寫一份致馬歇爾公開信，並譯成英文登載在國外報刊，以批評國府。分會各項動作，讓省府高層相當不悅，開始監控陳翔鶴等人。[41]

1946 年底，李劼人掛名《四川時報》副刊主編，找中共地下黨人洪鐘負責業務，將它辦成反國民黨政權的宣傳陣地。1947 年 1 月，隨著馬歇爾調停失敗，戰爭成爲解決國共紛爭的唯一方案，李劼人在此刻於報紙發表連載小說《天魔舞》，內容描寫國府統治大後方的各種弊病。在國民黨與外界眼中，很容易會將李氏歸爲中共同路人。儘管如此，這並不表示李劼人已決意走中共革命道路，也不等於中共認可李劼人爲革命同志。[42]

1947 年 5、6 月間，省府軍警大肆逮捕中共地下黨人、左派人士，陳翔鶴、洪鐘先至李劼人家躲避，《四川時報》副刊因此停辦。[43]李劼人指示謝揚青幫助陳翔鶴前去樂山躲藏，至 1949 年共軍佔領成都爲止。[44]李氏又撥款資助洪鐘出版新華社文件，並發表文章批評時政。軍警忌諱其身分，決定逮捕其子女，藉此警告他。李劼人的子女在川大讀書時，先後參加中共地下黨人主導的社

40 李劼人，《李劼人全集》，卷 10，頁 103。
41 謝揚青，〈李劼人先生與「文抗—文協」成都分會片斷〉，收入《李劼人研究：2007》，頁 131-132。
42 中共 1953 年 4 月在一份評鑑報告，指出李劼人在國共內戰時有反國民黨行動，「但認識很不徹底，態度更不堅決，基本上走的是中間路線道路」。國共和談破裂後，「以毫無是非觀念的單純和平觀點寫小說諷刺雙方」。顯見，中共並沒有因爲統戰政策而忘記階級區隔。轉引自雷兵，「編年」，頁 127。
43 洪鐘，〈永恆的懷念〉，收入《李劼人研究：2007》，頁 138-139。
44 陳開第，〈陳翔鶴與李劼人〉，《新文學史料》，1992 年第 2 期，頁 28。

團，女兒李眉更加入民盟，成為旗幟鮮明的異議人士。1948 年 11 月，軍警因其子李遠岑參與學運，認為他是中共黨員，派員去川大逮捕。李遠岑到處找藏身地點，大多親友為避禍不敢幫忙，唯有魏時珍讓他躲在私宅。[45]軍警隨後抓了李眉，又派人監控嘉樂公司與李宅。李劼人託四川省議會議長向育仁說情，李眉才被釋放回家。換言之，就算李劼人想走「中間路線」，其子女已進入左派陣營，他也無法再保持中立。共軍戰勝後，李劼人雖然擺脫掉國民黨政權的監控，但他不清楚，隨之而來的中共政權將創造一個出乎其意料的新世界。

三、中共新政治模式的實際運作

（一）實踐「團結」

中共政權成立，李劼人由實業家變為成都市副市長，主因是李氏由 1937 年起長期資助中共地下黨，被視為成都率先支持中共的人，加上他有一定的社會聲望與人際關係，具有代表性，遂成為中共首要拉攏對象之一。鄧小平在進軍西南前夕，已指出治理西南是一項困難的政治工作。西南是共軍最後進軍之處，以往中共在此實力薄弱，而地方勢力根深蒂固，民間武力興盛，必須小心慎重。鄧小平指出，除了發動群眾之外，運用統一戰線拉攏地方代表人士，藉以分化地方勢力，降低中共治理工作困難度，應成為治理西南的關鍵策略。[46]故此，中共邀請李劼人出任成都市副市長，不僅藉以回報李氏過去的支持，也展現新政權與地方菁英合作的誠意，對於心存觀望或疑懼的地方菁英，可產生積極的政治效果，是落實統戰政策的重要一步。

1949 年 12 月底，中共佔領成都，隨即在 1950 年 1 月邀請李劼人擔任副市長。對李劼人而言，對於是否為新政權工作，他仍然心存顧慮，未立即答應。但中共並沒有放棄，同年 7 月，再透過其老友張秀熟與中共川西區黨委統戰部

45 悼念魏時珍先生紀念文集編輯組，《魏時珍先生紀念文集》（成都：編者自印，1993），頁 107-108。
46 鄧小平，〈克服西南工作困難要掌握好三個法寶〉，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重慶市委員會編，《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頁 4-9。

長兼成都市長李宗林，輪番勸進，讓他感受到中共的眞心誠意。李劼人遂向中共統戰幹部，例如李宗林，提出內心的想法與不安。李氏表示他在當地親戚故舊門生太多，免不了會有許多人情請託，「將來必弄出麻煩」。李宗林則回應「我還不是一樣的？」並表示「能推脫的就推」，若實在沒辦法，就交給統戰部門處理。[47]此外，李氏怕進入政府工作，無法兼顧嘉樂紙廠，中共統戰部則對之曉以大義，表示爲「七十萬人做事貢獻更大」，讓他無話可說。但他心中最大的顧慮，是怕中共只是找他這個外人作裝飾，不會放權給他盡情發揮，又擔心與中共幹部共事能否產生好的化學效應。李氏想要做個名實相副的副市長，獨當一面發揮所長，但對中共建立的新體制過於陌生，以致舉棋不定。[48]

李劼人最終會點頭答應，除了是因爲感受到中共的誠意，也是因爲自認終於找到能夠發揮志向之處。正如他對李眉所言，過去發誓不當官，主要是一路從「清朝」看到「民國」的官，都是「腐敗透頂」。相較而言，「共產黨的朋友，我認識不少，都是好人。我們這個國家，國民黨搞不好，看來只有共產黨來。」他尋覓多年，終於碰到「好人政權」，認爲能與「共產黨的朋友」共創新局。[49]亦即，「好人」，或者說「共產黨的好人朋友」，成爲他加入新政權的關鍵。

李劼人判斷「共產黨的朋友」是「好人」，不是基於意識形態或政治綱領，而是來自良好的人際互動。根據陳翔鶴回憶，他從來沒聽過李氏批評延安，也常把「延安是對的」掛在嘴上。看來李劼人似乎對中共有相當研究，才會有如此篤定的態度，但實情則不然。李劼人有一次與陳翔鶴深談，坦白承認：「馬克思主義的書嘛，我一本也沒有讀過，不，連一章也沒有讀過，可以說一竅不

47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頁 30。李宗林（1906-1967）爲成都人，1926 年成爲中共黨員。1937 年在延安，後來成爲賀龍秘書，1949 年跟隨賀龍至成都，長期擔任成都市長，以及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部長。參見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川省志．人物志》（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頁 263-265。

48　雷兵，〈「改行的作家」：市長李劼人角色認同的困窘（1950-1962）〉，《歷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頁 22-24。

49　李眉，〈李劼人軼事〉，收入《李劼人研究：2007》，頁 102-103。

通。」但是，他認爲「中共遲早總會統一中國」，原因在於「政治、政策，總是要靠人來搞的，好人全都變成共產黨了，所以中共一定就會得到勝利。」[50]由此可知，他對中共的好感，主要是來自與共產黨友人的情誼，愛屋及烏所致。

李劼人認爲政治、政策的關鍵在於人，只要是「好人」，政治自然上軌道，確有幾分道理。問題在於政治運作是一個複雜現象，除了人以外，還有體制、政黨、社會、意識形態等各項因素，若是簡化成「好人搞政治」，是模糊且經不起現實考驗的。由此可見，李劼人對於實際政治的理解，還停留在強調關係、人情的傳統層面，對標榜主義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所帶來的新形態政治文化缺乏清楚的認知。他沒有想到，好人一旦變成黨員，特別是服膺社會主義，講求組織紀律，絕對服從的共產黨員，經過一連串「階級」政治教育後，會產生質變。對他的共產黨朋友而言，「人情」之上更有「黨性」，黨員與非黨人士的往來，必須依照黨的政策，嚴守階級分際，而非任憑私情爲之，否則在黨內就會遭到諸如小資產階級利己主義、缺乏黨性之類的批評，這是李氏未能明瞭之處。

郭沫若是中共黨員，也是李劼人的同學，他在抗戰前夕發表〈中國左拉之待望〉一文，大力推薦李氏的小說，期盼他成爲中國左拉。之後郭氏與沙汀會面，卻特別問他：「你看李劼人是不是青年黨？」[51]由此可見，李劼人的階級背景，以及與青年黨人的私交，讓即便是與他同窗的郭沫若，都要先弄清其政治立場，避免違背黨紀。黨員與非黨員建立關係，遵循黨紀、執行黨的政策爲重要考量。李劼人參與成都文協活動，地下黨員洪鐘因爲李氏的「一些老友是青年黨頭目」，對他的政治態度有所疑慮，並跟陳翔鶴表達自己的想法。陳翔鶴開導洪鐘：「交幾個反動朋友不能和政治態度劃等號」，李劼人是「開明的、進步的」，政治上不會被影響。[52]陳翔鶴同意洪鐘將青年黨視爲「反動」，但認爲李劼人是「進步的」，在政治上爲可爭取的對象，要洪鐘有分別對待的態度。

50 陳翔鶴，《陳翔鶴選集》，頁 403-404。
51 沙汀，《雜記與回憶》（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頁 61-62。
52 洪鐘，〈永恆的懷念〉，收入《李劼人研究：2007》，頁 137。

陳翔鶴的做法，主要是遵從當時在大後方主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周恩來的指示。周恩來在 1939 年、1942 年分別提出「積極扶持同情分子，努力爭取中間分子，尤其是知識分子與公正商紳參加抗戰，擴大統一戰線」，與共產黨要「勤業、勤學、勤交友」（簡稱三勤）的原則。[53]陳翔鶴身為成都文協中共地下黨負責人，對於李劼人這類「同情分子」、「公正紳商」，不但要以身作則「勤交友」，也要引導下級認清政策走向。故此，李劼人在這種基於統戰團結的善意氣氛下，自然很容易對「共產黨的朋友」留下好印象，進而有「好人」的評價。

相較李劼人對前景的美好判斷，中共在建國後的統戰政策也面臨一些現實課題。依照中共的階級觀點，資產階級本質上是敵人，與無產階級處於對立面，這項原則從未改變。然而在政治操作上，又必須因應實際情況來聯合資產階級，以打倒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封建地主階級與國民黨政權，因此團結資產階級便成為抗戰時期的主軸。隨著 1947 年底在國共內戰中逐步佔領中小城市，並直接治理居住當地的資產階級，中共對他們的不信任感開始展露出來，即便有聯合政府這個大架構的想法，中共高層仍要提醒各級幹部他們在階級上不是一家人。

中共在國共內戰逐漸取得優勢後，將資產階級排除於聯合政府之外的想法開始發酵，只是礙於現實，一時難以達成。事實上，對於是否真的要與資產階級合作，共同組織政府，高層也曾猶疑不定。1947 年 10 月 10 日，毛澤東正式發表要聯合各民主黨派等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但最重要的聯合對象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因國府在 10 月 27 日宣布其非法，未經抵抗便自動解散，讓中共高層對政治上聯合資產階級的不安感加劇，擔憂到底能否主導統一戰線的實質運作，讓資產階級心無旁騖地跟著黨走。同年 11 月底，毛澤東向史達

53　周恩來，〈關於統一戰線的方法、策略和守則（提綱）〉，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 44；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第 1 卷．1921-194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頁 350。

林（Joseph Stalin）提出要仿效蘇聯建立一黨執政政權，但民盟隨即於 1948 年初在香港宣布恢復活動，毛澤東只好打消此念頭。中共在聯合政府課題上的反覆，顯示他們對如何具體落實與非黨人士建立聯合政府，仍存有許多不確定性與疑慮。

1949 年初，中共取代國民黨建立新政權的目標即將實現，究竟是否眞的要建立聯合政府，必須要有明確的定案。史達林派遣米高揚（Anastas Mikoyan）秘密來華指導中共建國的各項原則，也親自打電報提示中共相關事項，強調要聯合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合組政府，中共高層方才定調，成爲「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核心政策。[54]

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中共在西柏坡舉行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以統一黨內共識，核實各項建國政策原則。毛澤東在 3 月 5 日發表大會報告，明白提出即將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在中共領導的工農聯盟基礎上，要盡量團結城市的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毛表示：「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給他們工作做，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使他們在工作上做出成績來」；而且，「每一個大城市和每一個中等城市，每一個戰略性區域和每一個省，都應當培養一批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有威信的黨外民主人士」。但毛也同時強調，要把黨外民主人士視爲與中共幹部一樣，與他們共同商量和解決各項問題，並「從團結他們出發，對他們的錯誤和缺點進行認眞的和適當的批評或鬥爭，達到團結他們的目的。對他們的錯誤或缺點採取遷就態度，是不對的。對他們採取關門態度或敷衍態度，也是不對的。」[55]亦即，毛以「既團結又鬥爭」作爲與黨外人士長期合作的基本原則，「團結」是爲了現實，「鬥爭」則是堅持階級界線，是一個兼顧現實與理念的方式。李劼人正是在此一原則之下，成爲中共在成都選擇的合作對象。

54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冊 1，頁 463-472。

55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卷 4，頁 1374-1376。

毛澤東定下基調後，劉少奇、周恩來也透過各種方式強調聯合資產階級的必要性。例如劉少奇為安撫工商界，特地在 1949 年 4、5 月間去天津與工商業者座談，展現高度善意。[56]但是，中共黨內對於黨外人士在新政權佔有一席之地仍感到不滿，當時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就指出，黨內有些人存在「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不願意跟階級敵人分享權力，希望盡快消滅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並抱怨「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有的人則輕視統戰政策與執行幹部，將「統戰路線」等同「地主路線」，認為統戰路線彷彿是跟階級敵人妥協。反之，也有人執行統戰過於重視「團結」，而「遷就」黨外人士，忘了毛澤東要「適當的批評或鬥爭」的提示。[57]換言之，中共內部對於建國後要如何與「敵人共舞」，運作政治，也處於摸索與適應的狀態。

1950 年 3 月，中共為此在黨內召開第一次全國統一戰線工作會議，李維漢發表了經毛澤東審閱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新任務〉報告，以整合內部意見。李維漢再次宣示聯合「中間力量」（中小資產階級）的重要性，並批評黨內有些幹部輕視、不重視民主黨派與黨外人士的錯誤心態。李氏將「中間力量」更具體地分為三個範疇，分別是「中左」（一般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中間」（一般民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與「中右」（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中帶著較多封建性和買辦性）。他提醒中共幹部要依循「既團結又鬥爭」的原則，「團結中左分子，穩定中間分子，改造中右分子」，並強調鬥爭不是為了消滅，而是旨在促進團結「中間力量」。[58]

在此一內部會議中，中共各級幹部也提出對於統戰政策的意見，李維漢將它們歸納為兩種心態：一為立即消滅資產階級，另一則是取消民主黨派。簡而言之，就是想要獨佔政權。周恩來至會上報告，特別回應黨內的不同聲音，指出現階段的核心議題「不是什麼推翻資產階級，而是如何與他們合作」，要重視民主黨派的代表性。會後，毛澤東聽取匯報，也指示現階段是以團結「民族

[56] 王光美，《我與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 47-55。
[57]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 677。
[58] 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頁 57-67。

資產階級」爲主，鬥爭的焦點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國民黨」。毛並要黨內重視民主黨派的作用，幫助他們，並解決其「經費問題，幹部學習和失業問題」，「要照顧他們的生活」。[59]

換言之，中共中央領導人明白表示，無論如何，黨內幹部面對本質上是敵人的黨外人士，都得接受他們當下在體制內必有一席之地，要學習與他們共事，並在不違背原則下照顧他們各方面的需求。由此可知，李劼人感受到中共的情義殷切，以爲可以跟共產黨的好友攜手共創美好未來，殊不知事情並未如表面上一般簡單。中共高層爲了統一共識，必須透過宣導、指示，甚至親身示範等方式壓住黨內異音，確立與黨外人士共事的大方向，但這不表示黨外人士可以在聯合政權體制內如魚得水。毛澤東、周恩來、李維漢等人一再強調團結黨外人士的重要性，皆是著眼於政治現實需求，視資產階級爲敵人的觀念並未改變，一旦黨外人士不服從中共的領導，成爲實踐社會主義理念的障礙，毛等人也會立即轉向鬥爭。

中共對於黨外人士的階級敵視心態，成爲諸如李劼人等進入體制的黨外人士隨時可能陷入危機的不定時炸彈。也正是由於這種根深蒂固的心態，即使李維漢在報告中提出：「使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思想從上而下切實貫徹到全黨組織特別是全黨幹部中去」，[60]各級幹部依舊不時以實際行動排除或輕視黨外人士。1949 年 7 月，中共成立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簡稱文聯），以團結全國的黨外文藝人士；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在 1952 年負責籌辦文聯第二次全國代表會，打算取消文聯，仿效蘇聯文藝制度改成各類專門家協會，並將長期不創作但仍掛名在文聯裡的老牌文藝人士除名。此舉引致毛澤東震怒，認爲取消文聯不利於團結資深黨外文藝人士；毛澤東再度強調「黨與非黨的聯合是長期存在的」，甚至不再讓胡喬木處理文藝界日常事務，改由周揚接手主導。[61]

---

59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 679-682。

60 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頁 6-7。

61 徐慶全，《革命吞噬它的兒女：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 50-51、452。

如胡喬木這類與高層關係緊密者，對「統戰政策思想」理應較大多中共幹部清楚，但在執行上依舊有「關門主義」之舉，各地黨政幹部與黨外人士的互動出現摩擦與不快的情況，也就不難想見。另外，大量沒有實務經驗的年輕新幹部進入新政權體制，對政治情勢變化尚處於摸索狀態，掌握政策也欠缺火候，難免有憂讒畏譏，或者積極過火等表現。而除了李劼人、中共幹部外，社會各階層對於「黨外人士」這個伴隨中共建國而出現的新生事物，實際上也相當陌生，對於其政治分量與地位各有不同解讀。有的人可能認爲他們同過去一般是「官」，有的人也可能視他們只是擺設而沒有實權。這些因素相互作用，在在影響中共團結黨外人士的實際成效。黨外人士可能認爲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進而對執政當局心生不滿。中共一方面要處理這些狀況以維持團結局面，另外則列爲考察敵人心理動態，評估黨外人士政治態度變化的情報，待鬥爭時再派上用場。

李劼人擔任成都市副市長後，中共將市政府的民政、文教、衛生與建設四個局分配給他負責。他很快便全心投入市政工作，從不缺席各項例行會議，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見與看法，以及一些具體方案，甚至與中共高層的想法不同進而發生爭論，依舊堅持己見。由此可知，李劼人在心態上很快地就由民間人士調整爲副市長的角色，也用實際行動展現其旺盛企圖心。正因爲如此，在現實政治運作中出現的一些狀況或摩擦，若使李劼人感到不受尊重或被輕視，往往會觸動他心中最在意的「有職有權」的敏感議題，而中共成都市黨委統戰部則需要適時處理，以避免損及最高當局交付的貫徹團結黨外人士的政策。畢竟讓黨外人士「有職有權」，也是高層一再強調的要點。

李劼人進入體制後，中共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發現他相當在意「協商」。亦即，李劼人希望中共推行政務能夠事先跟他商量，並徵求他同意，才是體現「有職有權」。中共幹部自認起先沒注意此細節，導致李劼人不滿，故隨即改善缺失，凡事跟他商量，甚至各項以市長名義發布的政府公文都先讓其過目，以消除李氏的負面情緒，讓他感受到自己不是花瓶，而是貨眞價實的副市長。

經由這樣的舉動，中共幹部要讓李劼人感受到他們的承諾不是空話。[62]

中共基於團結的舉措，表面看似友善尊重，實際則隱含上對下的施恩，而且是無產階級勝利者對階級敵人的寬大。李劼人即便對馬克思主義毫無概念，但從現實政治的運作，也能感覺到中共刻意營造的團結背後隱含著隔閡。成都市政府除市長李宗林外，另一個副市長爲中共黨員米建書。對中共而言，市府實際領導者爲李宗林與米建書，而不是李劼人。李劼人發現，每當施政出現狀況，當局一定避開李劼人而責備米建書，甚至有些項目即便本是由李氏處理，也依舊要米建書負責，讓李劼人感到中共並沒有把他當自己人。[63]中共這種看似保護黨外人士的舉動，正凸顯出內心眞正的想法，亦即聯合政權的本質是中共專政，李劼人有職有權的基礎來自黨的主觀意願。故此，當局無論何事都要米建書負責，儘管看似不合理，卻眞正符合中共的政治運作邏輯。

成都市政府在市長李宗林身兼黨委統戰部部長的情況下，實際運作中依然有許多地方讓李劼人產生不滿情緒。市府各級單位幹部對團結黨外人士政策缺乏認識，也不會像高層那樣細心地關注並耐心地調整應對方式，更容易讓李劼人這種自視甚高之人感到不受尊重。例如，李劼人擔任副市長後，一次共軍在成都挨家挨戶進行武器搜查，他的住處並未豁免。另外，他從不參加街道委員會，管戶籍的公安幾次找不到他，就跟他的房東說：「回去給人說，這是無組織。」[64]最嚴重的一次，則是他坐人力車去市府上班，到大門口時遭守衛阻擋，要他下車走路進去。李氏出示證件表明身分，守衛依舊不放行，而此時一輛汽車卻直接駛入市府，車內人並沒有被攔下。李劼人氣得掉頭回家，接連好幾天不上班。市府派人至他家關心，他講出原因，表示：「我不像個市長！」李宗林市長爲此出面善後。[65]

---

62 雷兵，〈「改行的作家」：市長李劼人角色認同的困窘（1950-1962）〉，《歷史研究》，2005年第 1 期，頁 24-25。

63 轉引自雷兵，「編年」，頁 160。

64 轉引自雷兵，「編年」，頁 158。

65 李眉，〈李劼人軼事〉，收入《李劼人研究：2007》，頁 104-105。

這些小事看似與大局無關，卻一直留存於李劼人心頭。直到 1957 年中共發動「雙百運動」——對藝術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對學術工作主張百家爭鳴——他才在各項會議中吐露出來，當作中共官僚主義作風的例證。他認為身為副市長居然被普通小吏刁難，如果當時他即時處理，官僚主義就不會形成嚴重問題，中共也就不需推動雙百運動，靠黨外人士大鳴大放來幫助中共解決難題。換言之，李劼人認為是因為黨外人士一時疏忽，導致中共體制出現官僚主義積弊。

由此可知，李劼人還是以舊時代的心態去看待中共建構的新體制，認為知識分子，特別是在體制擔任官職者，在社會上應該享有一定的尊重。他沒有意識到所謂的「有職有權」、「副市長」，都是中共基於團結而授與的政治禮遇，一旦中共決定改變對待黨外人士的政策，他在新時代擁有的政治地位、社會聲望，以及物質享受，將可能化無烏有。他並未認清自己在中共體制內看似存在自立空間，實際上卻成了中共體制的依附者。反之，對中共而言，李劼人認為自己是副市長，在體制中應該享有一些特權，這不但是舊時代封建官僚習氣，也是一種無組織、無紀律的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作風，必須在適當時機對其進行「批評或鬥爭」教育，而李劼人的各項反應都是最佳的檢討素材。

李劼人在 1957 年趁著雙百運動講出實例，證明政治體制運作的缺失，其中固然是以朋友立場為中共建言，但也是為自己在官場上受到冷遇，藉機一吐累積多年的怨氣。他在 1954 年表示，當年夏天去朝鮮勞軍返國後，發現自己逐漸進入真空地帶，市府幹部不再理會他，開會也是臨時通知，而非事先告知，他在市府中忽然間成為可有可無的閒置人員。李劼人對市政從有心無力變得意興闌珊，剛好這時出版社有意重印其著作《大波》，但內容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他遂向上級申請將大部分時間放在修改舊作，剩餘時間再處理公務。李劼人的請求獲得批准，並由城內公家宿舍搬回郊外私宅，大多時候都在家中寫作，有重要會議等才入城工作，這也成為其人生最後階段的日常模式。[66]論

66　雷兵，〈「改行的作家」：市長李劼人角色認同的困窘（1950-1962）〉，《歷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頁 27-28。

者認爲李劼人始終無意做官，眞正的心願是以馬克思主義文藝觀重新修改作品以提升品質。[67]修改舊作確實是李氏人生最後幾年主要的工作，但他若能一直「有職有權」，應該也會很樂意將大多時間放在市政，而不是空有頭銜卻只能寫作。因此，他會在 1957 年公開談論自己處於眞空地帶狀態，正反映出他內心深處充滿無奈與不滿。

李劼人在 1954 年前後之所以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境遇，關鍵因素爲毛澤東在 1953 年決定提前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至社會主義社會，並在 1954 年 2 月經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確立過渡時期總路線，連帶改變對待資產階級的政策。中共中央統戰部早在 1952 年 6 月爲因應三反、五反運動結束，經濟復原狀況良好，又將在 1953 年推動第一次五年計畫，政治與經濟體制將進入新階段，而召開第三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以對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的工作問題爲討論核心。毛澤東認爲之前工人階級的主要敵人是地主與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可作爲被爭取的中間階級。隨著地主、官僚被打倒，國內下一階段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不再是中間階級。第三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將毛澤東的最新指示下達各級幹部，要他們掌握最新的政策變化。中共中央強調民族資產階級已成爲主要敵人，但仍不將民主黨派排除於體制外，「既團結又鬥爭」依舊是統戰工作的原則，同時也要確立他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68]1954 年 9 月，中共接著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之取代政治協商會議成爲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並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又稱《五四憲法》），宣告社會主義社會將是新階段的主要目標。

中共雖然強調讓民主黨派人士留在體制內是爲了「共同監督」，但實際上從掌政初期就已開始往讓他們長期依附中共的方向發展，尤其是 1957 年反右運動後，「統戰」更轉變成爲「馴化」。[69]故此，李劼人進入一個奇特的情況，中共在政治上讓他從有職有權日漸變爲有職無權的擺設，但在物質待遇方面則

67 馬識途，〈應該好好研究李劼人〉，收入李劼人研究學會編，《李劼人研究》，頁 4-5。
6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 729-731。
69 胡治安，《統戰秘辛：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頁 51-52。

逐漸提高，讓他享受到地方高級幹部應有的各項權益。李劼人擔任副市長之初，除了政務參與度，生活待遇也是他在意的面向。為了方便參加各種政治會議與社會活動，他在 1950 年冬特地從郊外私宅搬入城中，因市府沒有提供公家宿舍，而賃居在嘉樂紙廠經理程雲集家。[70]除租屋費用外，李劼人因參與各項公務而增加許多開支，這讓他頗有微詞。[71]中共統戰部注意到此層面，在 1953 年 10 月的報告表示，起初對李氏「生活幫助上少些」，使他自己提出「要求」，隨即提供「住房、修房、電燈、電話、倉庫工人」等，讓他「很滿意」，「工作上亦表現了很積極」。[72]換言之，毛澤東提出要在生活上幫助在體制工作的黨外人士，惟各地幹部在執行上仍有許多待摸索與疏忽之處，需要統戰對象反應才能夠瞭解與改善。

中共一開始在照顧李劼人的生活上出現疏失，除了是因無前例可循外，建國初期經濟困難，財政匱乏，只能先顧及基本需求，加上當時配給與工資雙軌制並行，造成運作上的混亂，也是原因所在。中共在延安時期即實行配給制，黨政軍幹部不發薪而依等級享有不同生活待遇。建國以後，對於進入體制的統戰對象，中共依照舊例發給薪資，中共幹部則維持配給制，如此一來，便出現黨外人士希望能像中共幹部擁有住房、配車、醫療、秘書等生活待遇，中共幹部則對黨外人士有薪水可以消費購物感到羨慕的情況。[73]

為了解決配給與薪資雙軌制，中共在 1954 年開始試行工資制，李氏的副市長職級定為行政十級，每月工資 1,597,500 元（舊人民幣）。[74]1955 年，決定全面採取職務等級工資制，黨政職務分三十個等級，十三級以上為高級幹部。此外，行政十級以上幹部享有原供給制的各項物質供應，與宿舍、秘書、

70 嚴曉琴主編，《李劼人與菱窠》（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9），頁 116。
71 轉引自雷兵，「編年」，頁 127。
72 轉引自雷兵，「編年」，頁 131。
73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冊 1，頁 412-459。
74 轉引自雷兵，「編年」，頁 131。中共在 1955 年 3 月推動幣制改革，一萬元舊人民幣折算為一元新人民幣。

警衛、司機等待遇。[75]此外，隨著國家整體財經狀況好轉，中共國務院在 1956 年又召開全國工資會議，決定提撥 14 億人民幣增加各級職工工資，較 1955 年工資增長 14.5%。[76]而中央與地方的高級幹部與親屬，可以使用不對一般民眾與幹部開放的招待所、療養院與醫療服務。換言之，李劼人可同時享有薪水與各項生活待遇，過著相當不錯的生活。浙江省文聯主席宋雲彬 1956 年 12 月至成都參訪，李劼人招待他觀賞私人收藏、喝咖啡、享美饌，讓宋氏感到「李劼人是一個很懂生活的人」。[77]

李氏雖然在政治上「有職無權」，但從他的各項生活待遇來看，中共對於團結統戰對象依舊沒有絲毫鬆懈，也不吝給予其政治地位應有的權益。另外，也可由此看出雙方都處於相互適應的過程，李劼人認爲彼此是友善相互合作的關係，所以從他對「政府官員」的既定認知出發，向中共爭取他應有的權益。中共則是依照對待黨外人士的統戰政策，來處理李劼人的各項要求。但是對中共而言，團結與鬥爭本是一體，不可能只偏重一面。李劼人的各項反應與行動，固然展現其自主意識，卻也處處體現出資產階級自私自利、注重「小我」不顧「大我」的本質，必須進一步透過批評與鬥爭的方式，來教育、改造他的思想，更要讓他服從中共的領導，讓他牢牢依附於體制。

（二）鬥爭、改造與教育

既團結又鬥爭是中共對統戰對象的既定政策。毛澤東認爲不但要照顧他們的生活與物質需求，同時也要改造他們，幫助他們進步，因爲「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們要解放全人類，資產階級、地主也要幫助他們解放，

75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冊 1，頁 456。中共在 1955 年又數度調整各級幹部薪資，根據李劼人在 1961 年 5 月 31 日寫給李眉的信，他當時的薪資爲人民幣 195.5 元。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117。

76 陳明遠，《知識份子與人民幣時代》（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頁 90-91。

77 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 432-433。

改造他們。這就是博愛。」[78]換言之，團結與鬥爭並用，是屬於中共的「博愛」。李劼人進入體制後，中共除了對他細緻關懷、耐心照顧，也利用各種機會來教育、鬥爭、改造他，讓他一步步將身心靈轉換爲無產階級新社會的一分子。李劼人不見得能認同與體會毛澤東的「博愛」，但這肯定會成爲他從未預期的人生體驗。

中共對李劼人的改造，可以說是由外而內，由寬到緊，依照不同時期的政治運動與整體情勢，進行間接或直接的教育或鬥爭。中共對李劼人進行的第一個無產階級教育，是從他經營多年的嘉樂紙廠著手。嘉樂紙廠因爲國共內戰而一度面臨倒閉，共軍佔領成都後，中共川西區黨委書記李井泉即下令購買囤積紙，使嘉樂紙廠恢復生機。1950 年，中共又提供三次貸款，幫助紙廠度過難關，使李劼人感激在心。孰料中共在照顧李劼人紙廠的同時，也準備將其公有化。中共先是掌控紙廠工人，於 1951 年在工廠內建立黨團組織，並籌組工會；中共樂山地委與樂山行政專署又派工作組，在紙廠進行民主改革等運動，以裡應外合的方式，一步步加強對紙廠的控制。[79]此舉也等於掌握李劼人立足社會的最關鍵基礎，讓他在現實中朝中共體制靠攏。

中共逐步控制紙廠的同時，李劼人也面臨各種政治運動考驗。[80]土地改革是中共建國後的首要政策，爲李劼人所面臨的第一次政治教育與立場測試。劉少奇在 1950 年 6 月全國政協會議討論《土地改革法》時就說，「地主總有痛苦，與地主有聯繫的也痛苦。過這一關。不要聽自己親戚朋友講，你幫他，他會神氣十足反對農民的」；「只有代表農民、贊助農民，才能實行土改。如你

7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上冊，頁 19。

79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5。四川卷編輯組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四川卷，頁 445-446。

80 關於中共在建國初期推動鎮反、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相關情況參閱：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冊 1。Julia C. Strauss, “Paternalist Terror: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53,”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4:1 (January 2002), pp. 80-105; Frank Dikötter,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1957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3).

不贊成農民，口喊土改是假的。」[81]毛澤東在會議閉幕時致詞，也說「戰爭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時期內考驗全中國一切人們、一切黨派的兩個『關』。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麼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只要戰爭關、土改關都過去了，剩下的一關就將容易過去的，那就是社會主義的一關，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那一關。」[82]

顯而易見，中共在 1950 年 6 月時就已將「過關」的底線劃出，即是站在「農民」這邊，無論再「痛苦」也都要忍住不幫「自己親戚朋友」。李劼人因被評爲中農而免於參與土改，親朋好友則多被波及。當時在體制內的中共幹部與黨外人士，同樣都面臨這一考驗關卡，他們的實際作爲就是評鑑能否過關的準則。儘管如此，土改前奏的減租退押運動推動後，許多人找李劼人幫忙，他還是寫了許多「關說信」給成都市長、統戰部、農協等，請求協助處理，而在摯友魏時珍遇難時，更是不遺餘力。

魏時珍爲青年黨四川黨部要角，又擔任過國府國大代表，1951 年 1 月底被中共列爲管制對象，入政訓班接受政治審查，與外界隔離。魏時珍受管制期間，被農協追討退押金，可說處境艱難。李劼人寫信給相關負責人，說明魏氏無退押問題，[83]又透過各種管道竭力營救，令中共地方高層深感不快，認爲他自不量力，不識大體，過分著重私情。至 6 月，因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張瀾向周恩來求情，經中共高層討論，才下令釋放魏時珍。[84]中央下令後，川西各界人民協商會開會討論，李劼人在會議上不僅替好友抱屈，又節外生枝，爲舒新城澄清其非青年黨人，此舉等於再度展現其不正確的政治立場，以致當場被人

81 薄一波記錄，〈少奇同志在政協會討論土地改革法後的結論〉，四川省檔案館藏，建西 1-001-164，「川西區黨委：（1950-1952），毛主席、劉少奇、張際春同志及中央、西南局、區黨委關於土改工作的指示」。

82 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卷 6，頁 80。

83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9。

84 李劼人研究學會編，《李劼人研究》，頁 305。

指出他曾在《醒獅》發表文章，暗示他亦有參加「反動黨派」之嫌。[85]李氏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有歷史問題，只是中共暫不過問，並早已記載於黨內評鑑報告之中。

中共因魏時珍事件，已對李劼人不滿。1951 年底，李氏好友張頤的姪子張文湘被土改團評爲地主，土地房產遭沒收，張氏叔姪因而向李劼人求援。李劼人向當局反應不必如此過分，被中共認爲妨礙土改，遂由成都市委統戰部副部長熊揚寫信警告他。熊氏信中轉達土改團對他的意見，認爲李氏視「地主一言，重如泰山，不加分析，武斷偏聽」；「北京民主人士，也有『如此市長』之感」。李劼人無法接受，次日即回信反擊。他表示，陳翔鶴早已說他「愛管閒事」，往往沒弄清楚狀況就向上反應；他並辯解道：「代某些人寫信反應，只是爲了掃除不了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中殘存的人情關係，而絕非有意混淆黑白，要人違反政策也。」又強調：「在此一年多，我差不多已做到了『六親不認』，來麻煩你同諸公的，已經是千分之一二，而你同諸公已經感覺我爲地主說話已經太多，……請你代我想想，我之麻煩，我之感，又當如何？」信末甚至請熊揚代請調職，「因爲我有自知之明，這樣拖下去，只有公私交弊而已！」[86]

李劼人的回應，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同情被視爲階級敵人的地主，對中共而言恰恰證明他沒有過關。故此，熊揚基於「批評或鬥爭」原則，寫信要他服從政策，不要妨礙土地革命，身爲副市長更須以身作則。李氏自認已自我設限並深感委屈，但不爲中共所認同，由此可以看出雙方認知上的差異。此外，信末要求調職，更是觸犯中共政治禁忌。例如吳晗在中共未經他本人同意下，就被直接任命爲北京市副市長，他想要辭職，中共非但不准，還要他爲「知識分子的潔癖」自我檢討。[87]可見，中共認爲讓黨外人士進入體制是一種恩賞，讓他們在新社會有棲身之處，他們若是推辭，則表示缺乏階級覺悟與爲人民服務的熱忱。李劼人起先可再三推辭，估計也是因爲成都屬於新區，

85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26。
86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29-30。
87 張仁善，《1949 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237。

中共需要刻意籠絡地方菁英。可是，他擔任副市長後非但沒能協助政府推動政策，反倒因一受到批評就希望調職，更加深中共認爲他是無組織、無紀律的資產階級的印象。

中共發動土改運動後，緊接著於 1951 年末發動三反、五反運動，工商業者成爲鬥爭目標，李劼人這次無法置身事外。有人檢舉李劼人將政府貸款用於囤購物品，並逃漏稅，也有人自認收過來自紙廠的賄賂。針對這些舉報，李氏到處喊冤，表示這些都是幹部用刑逼出來的結果。此外，中共組織民主黨派人士舉行學習會，李劼人卻不當一回事，甚至發言替「資產階級」辯解，更讓中共確認他是「完全代表資產階級」。[88]中共受理這些指控，派人到紙廠查公帳，並去李劼人家審查私帳，沒找到罪證，卻反而發現他沒領到足額薪資，因此發錢補足缺額。[89]中共是眞的找不到罪證，或刻意放過？仍待進一步商榷。中共發動三反，主要是趁全國高度關注韓戰之際鬥爭資產階級，但隨著運動趨於激烈，影響經濟與社會穩定，中央認爲尚未到完全消滅資產階級之時，必須放緩步調。

李劼人雖然從各種指控脫身，但中共正以資產清理的方式讓公家主導紙廠經營權。交通銀行樂山分行在 1951 年 6 月派人與廠方合組清理委員會，釐清股權內包含多少「官僚資本」，欲將之收歸國有。中共的「官僚資本」，是一個定義模糊的政治性概念，最寬鬆的範疇是指國府時期的國家資本，以及軍閥、官僚等的私人資產，中共要將它們都收爲國有，[90]例如孫震、田頌堯的股份即爲「官僚資本」。此外，五反運動中，紙廠股東若有被指爲違反法律的，就以股票抵充經濟「贓款」，再以「退贓股票」轉成公股；至於股權不清楚者則歸爲國家代管股，藉此改變紙廠股權結構。1952 年算出公家股份約 42%，私股則是 58%。中共發動工人要求公私合營，1952 年 7 月，股東會只好向政府申請並獲批准，改爲四川省公私合營嘉樂紙廠，由公股代表楊斌接替李劼人

88 轉引自雷兵，「編年」，頁 120。
89 李眉，〈李劼人和嘉樂紙廠〉，收入《李劼人研究：2007》，頁 186。
90 鄭會欣，〈對「官僚資本」的再認識〉，《民國檔案》，2003 年第 4 期，頁 104-111。

爲董事長。李劼人就此失去紙廠，成爲僅領取固定股息的股東。[91]此後，他最主要的身分就是副市長，失去嘉樂紙廠後，只能更加依靠中共體制。

儘管歷經各項政治運動，嘉樂紙廠也被公私合營化，李劼人的心態仍未及時調整。中共成都市委書記郝得青在 1953 年 4 月評價李劼人，「立場是標準的自由資產階級」，爲人「很驕傲自大，除李井泉同志外，他誰也看不起，報紙也不看」，「說得多、做的少」，「對我黨的政策，如不涉及他親朋利益時，基本上是好的」，最後總結說「過去我們對他教育不夠」。[92]同年 4 月、10 月，四川省統戰部也有類似觀點，認爲李氏深受「舊思想、舊感情」影響，「曾經在很多與他個人及其親友有關的問題上與我們爭執，並常常無原則、無是非地爲別人講人情」，並經常抱怨；「我們的缺點是從政治上對他幫助不夠」。[93]可知中共認爲李劼人自視過高，又太注重個人與親友利益，不用心學習求進步，當局對他「教育不夠」。

中共對李劼人的評價日趨固定，而其政治處境也因中共朝社會主義社會過渡而進入眞空地帶。李劼人在 1954 年下半年後雖蟄居鄉野，但並不表示他就此放下政治，毛澤東在 1956 年提出雙百方針，讓他找到關懷時政與宣洩情緒的出口。李劼人未從中共的階級鬥爭著眼，仍將此運動視爲對友人進諍言，中共在 1957 年 2 月 17 日的內部評鑑報告即指出，李氏認爲「有花就放，而忽略了階級界線」。[94]與其說「忽略」，不如說「階級」從來不在他心上，而這也成爲他的致命傷。毛澤東在 1957 年 4 月 10 日的內部談話，已指明「百家」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而「爭鳴」就是「兩家」爭取處於「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95]究其實，雙百運動就是看「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是否眞心支持無產階級（中共）專政。中共眼中的資產階級分子李劼人如公開發言，內容一旦被認定是惡意抨擊政權，就等於「資產階級」攻擊「無產階級」。

91　四川卷編輯組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四川卷，頁 446-447。
92　轉引自雷兵，「編年」，頁 126-127。
93　轉引自雷兵，「編年」，頁 128-131。
94　轉引自雷兵，「編年」，頁 154。
9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 665。

在雙百運動中，諸多高級統戰對象，諸如章乃器、羅隆基等人，紛紛提出建言，各界知識分子也利用機會宣洩不滿，因而被中共打爲右派分子。但是，也有人逃過一劫。例如，梁漱溟原先曾於 1953 年在公開場合頂撞毛澤東，事後表示要閉門思過，對於自己行爲深感後悔，當時毛澤東也保有他的政協委員資格，各項生活照顧依舊保持。雙百運動期間，梁漱溟保持低調，有人刻意誘導，想要記錄其不滿言論，他反而痛哭流涕，感謝毛澤東的教訓與懺悔之情。[96]又如在重慶西南師範學院擔任二級教授的吳宓，也是當局重視的統戰對象。吳宓在土改期間曾經歷「文字獄」風波，後因爲當局從寬處理而躲過一劫。之後，他對政治絕不輕易表現意見，在雙百運動期間也盡量保持低調。[97]因此，梁、吳兩人未被中共列入右派分子之中。

李劼人在土改、三反、五反期間，也遭受過中共幹部的批評與審查，照理說應該要記取經驗，如同梁、吳二人，尋求趨吉避凶之道。但是，他終究沒能忍住內心的不滿，1957 年 5 月 16、17 日，他接連在民主人士座談會中大談中共官僚主義弊病，抱怨個人「有職無權」。[98]他不知道毛澤東在 5 月 15 日已將〈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給黨內高幹，鬥爭目標急速轉向右派。中共原本希望李劼人能起示範作用，派沙汀要他參加 6 月 3 日的四川省文聯座談會，帶頭抨擊右派。李劼人原先拒絕沙汀的提議，並勸沙汀不要發言以自保。沒想到，李劼人在當天出席發言，不罵右派，反倒批評中央有誤，並稱讚「右派」葛佩琦，表示「其言雖不足取，其心可嘉」，使李井泉極度不快，後更傳到毛澤東耳裡，讓李劼人陷入嚴峻的政治風暴。[99]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報》發布社論〈這是爲什麼〉，表示反右號角已經響起，中共四川高層於 7 月 20 日開始反右運動，內部把黨外人士劃爲

---

96 胡治安，《統戰秘辛：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頁 36-37。

97 王朝本編，《共和國時代的吳宓：以《吳宓日記續編》爲中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頁 138-140。

98 雷兵，〈「改行的作家」：市長李劼人角色認同的困窘（1950-1962）〉，《歷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頁 26-27。

99 沙汀，《雜記與回憶》，頁 62-64。

左、中左、中中、中右、右、極右六類，先定李劼人爲中中，8 月中旬再改爲中右，距右派只差一步。[100]李劼人一直不明白自己處境堪慮，至 8 月 20 日四川省人大開預備會，中共幹部才向他明示，說他之前數次發言是「嚴重錯誤」，讓他非常震驚，立即公開檢討。[101]李井泉聽完，批評他過去「是和右派分子共鳴」，這不是無心或偶然巧合，而是基於「階級立場的不同和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李井泉措辭相當嚴厲，[102]言下之意，就是把李劼人視爲階級敵人。

不久，高層指示沙汀告知李劼人，要再次公開檢討。沙汀原以爲李氏「性情直傲」，「不大可能檢討了又檢討」，不料他立即答應。[103]換言之，李劼人終於知道情況嚴重，必須認清現實，放下自高自大，選擇「檢討了又檢討」，才會有一線生機。8 月 29 日，李氏在四川省人大會議中進行第二次公開檢討，他擔心因不熟悉中共語彙而過不了關，遂由李遠岑事先寫好稿子，再由他公開宣讀。[104]事後中共仍不滿意，所以他又陸續再作了幾次公開檢討，才沒被正式公告爲右派。[105]中共鬥爭李氏，除了清算以往政治表現，補足「教育不夠」，更重要的是，「不服也要把他整服」，讓他體認唯有死心塌地接受黨的領導才行。[106]1957 年 11 月，中共讓李劼人續任副市長，但內部政治評鑑仍維持中右等級。[107]他成爲政治監控對象，無論是公開或私下的言論，或是與親朋好友的私信往來，都被抄寫或複製，至 1962 年過世爲止。[108]

---

100 雷兵，〈「改行的作家」：市長李劼人角色認同的困窘，1950-1962〉，《歷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頁 75。

101 沙汀，《雜記與回憶》，頁 64。

102 轉引自雷兵，「編年」，頁 187。

103 沙汀，《雜記與回憶》，頁 64。

104 Kenny Kwok-kwan Ng, *The Lost Geopoetic Horizon of Li Jieren: The Crisis of Writing Chengdu in Revolutionary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2015), p. 24.

105 李劼人研究學會、李劼人故居文管所編，《李劼人的人品和文品》（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頁 151。

106 李劼人研究學會編，《李劼人研究》，頁 306。

107 雷兵，〈「改行的作家」：市長李劼人角色認同的困窘，1950-1962〉，《歷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頁 82。

108 王嘉陵，〈錦城浮雲見玉壘：李劼人晚年書信二三事（上）〉，「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330/c404063-29899042.html （2018 年 4 月 26 檢索）。

經此折騰，李劼人深刻體會學習政治的重要。他在 1961 年寫信給中共文藝界高層劉白羽，表示每週至少參加數次政治學習，每天必看四份報紙，與《紅旗》雜誌等，「已成習慣，不可更改」。[109]由此可知，他似乎已明白追求中共所謂「進步」的重要性。但中共並未因此而改變對他的看法。成都市委統戰部在 1959 年 4 月的評鑑，指出李氏 1957 年的公開檢討「不深刻」，1958 年交心運動「持應付態度」。[110]中共在 1962 年 2 月的評鑑，更說「李在整風反右後，沒有接受教訓」，「常借題發揮與我進行鬥爭，實質上是一個資產階級反動派」。[111]爲何如此？這與大饑荒時期（1959-1961）李劼人的日常表現息息相關。

四、大饑荒時期統戰對象的生活

李劼人之所以願意「檢討了又檢討」，並出現與「以往基本兩樣」的情況，在於中共朝社會主義過渡路線的目標至 1957 年基本完成，各種資源集中於國家，成爲全面公有化，任何人都是廣義的「公家人」，依靠國家分配資源而活。假設李劼人既不檢討又率性求去，無公家安排根本無以維生，甚至波及家人。此外，中共以「包下來」的方式來對待統戰對象，不止提供國家名器，並依職級提供不同待遇，照顧食衣住行育樂各層面，讓他們比一般人、甚至大多數中共黨員享有較佳的生活，使其寧可留在體制，也不願失去政治職位。因爲一失去政治職位，即喪失各種照顧。換言之，李劼人對於體制更加依賴，自立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少。

中共在 1953 年先推動糧食的統購統銷以及農業合作化，掌握各項農業資源，逐步將糧食集中由國家管理。此外，又以公私合營將私人工商業整併至國家體系，掌握流通、行銷，以及販售管道，由此得以集中各種物資、商品。中

[109]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244。
[110] 轉引自雷兵，「編年」，頁 217。
[111] 轉引自雷兵，「編年」，頁 245。

共希望將中國轉型為工業社會，故透過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方式，利用與分配資源，使效能達到最大化，從農工業生產，到個人的日常生活消費都涵蓋在內。1953 年開始籌備按戶口配發糧食，到 1955 年，國務院頒布《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規定每戶人口依城鄉、年齡、性別、職業、機關單位等類別配給糧食，並發出定額糧票，每人必須持糧票與人民幣才能買到日常用糧。其後，陸續推出食用油、糖、豬肉、布匹等票券，每個人要搭配各種票券才能買到商品。1958 年，中共又推動商品分級管理辦法，將各種農副產品、食品、畜產品、絲、綢、工業原料等，依照性質與重要程度分為三類，全部列入國家行政體系管理。[112]質言之，中共體制影響個人日常生活的程度是史無前例的。

中共推動農業合作化成功，對建立社會主義體制更具信心，於是在 1958 年發動大躍進運動，希望一舉超英趕美，一時也頗具成效。為此，中共大幅提高糧食的徵調與徵購，然因各地上報糧食產量浮誇，導致糧食供應短缺，自 1959 年進入三年大饑荒時期。[113]為避免北京、上海等處餓死人，影響國際形象，中共連續三年從四川調出 147 億斤糧食，造成農村缺糧，農村人口大量死亡。[114]在此餓殍枕藉景況持續期間，中共對李劼人的各項照顧更為關鍵，但他仍感到日子不好過。他在 1961 年寫信給兒子，感嘆「想不到投老之年，又當國富民強、社會主義昌煥時代，反有生活之慮，亦奇也！」[115]為何如此？是因公家照顧不夠？或是還有其他因素？

李家基本人口數，包括夫婦、兩個親戚、孫子、佣人，與私人秘書，一共七人。孫子每月糧食配額 19 斤，秘書每月繳 20 斤當餐費；其餘四人在 1960 年 10 月前每人配 21 斤，其後調整為每人實得 23 斤；佣人原本每月配 28 斤，

---

112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商業卷，1958-1965》（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頁 46-64。

113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 Co., 2010).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9）。

114 羅曉紅，〈李井泉四川調糧真相：代價無奈 大愛無疆〉，《黨史文苑》，2012 年第 11 期，頁 23-27。

115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192。

1960 年 10 月起減爲 23 斤。因此，李家每月食糧合計約 154 斤左右，李氏也承認「以我們食量而言，此種定額，本來夠了」。但每人實際需求不同，例如秘書除星期日，每月約 27 天在李家搭伙。他飯量大，每天至少吃 1 斤，一個月消耗 27 斤，扣去他自備的 20 斤，不足的 7 斤勢必擠壓到其他人的額度。[116]此外，吃飯除主食外，尚包含肉類、蔬菜等副食品。中共爲照顧統戰人士，特別發配照顧肉票、照顧油票等。但這些「照顧」代價昂貴，價格都比市價高，例如菜油一斤的價格比市價多三倍，[117]加重了日常開支。加上體制照顧僅止於李劼人，家中老小與眾多親友也無法雨露均霑。

爲了解決食指浩繁、個人飲食習慣，與照顧親友等問題，李劼人將私宅開闢成一個小型農場，「庭院內外俱已開爲菜地」，又養了一頭豬，還有近 20 隻的雞鴨與兔子。李家種植的蔬菜、雞、鴨、豬肉等除了家用外，也會分贈給親朋好友分享。例如他養了一頭大白豬，預備在 1960 年底宰掉，做成醃豬肉、香腸、臘肉等物品以過新年，也會分贈給親友享用，而「已有六家人」向他要肉吃。[118]魏時珍在 1961 年初拿到肉後，寫信向李劼人道謝，表示「所賜豬肉，今尚未吃，已醃起，醃好再吃。今日曬出，見其膘甚厚，不禁雀躍，未吃如此肥肉已久故也。」[119]爲此，李劼人每月的生活成本增加不少，買豬、雞、鴨、菜種都要先花一大筆費用，接著要從黑市購買各種飼料餵養這些家禽家畜，各種花費下來要不少錢。以他在 1959 年 12 月一整個月的生活開支來說，從黑市買食物、肥料、飼料、柴火等，一共花了 358.44 元，[120]光靠他的固定收入不足以支付，只好以歷年儲蓄支撐。

---

116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85-86。

117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146。按，依照當時的規定，每月配給的票劵，要與人民幣一起使用才可以買到東西。沒有糧票，即便有人民幣也不能買到糧食。專屬油票價格比一般市價高三倍，亦即要搭配人民幣多付三倍價錢才能買到菜油。但是，這屬於專屬照顧，一般人沒有辦法拿到多餘的油票，也無法買到配給額度以外的物資。這是中共給予統戰對象的「特權」，也是要他們多出錢的「照顧」。

118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86。

119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148。

120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91。

李劼人利用自留地養家禽家畜與種菜，其實違反政策。四川在李井泉主政下，自大躍進就一貫堅持左的路線，從來不准私養豬，擁有自留地，[121]因此李劼人養豬在當時屬特殊情況，這算是中共對統戰對象的特別照顧。在絕大多數人不知肉味的同時，體制仍容許某些特殊群體可以養豬，背後凸顯出的是與體制越靠近的人，越容易受到照顧；反之，他們也較容易成爲最依附體制的人。

李劼人社會關係龐大，許多親友仰賴其照顧。有些人每月固定去吃飯數次，李氏又「義務供應」，過年佳節更是應接不暇，李遠岑曾爲此寫信質問母親。李劼人則回信表示不能怪親戚，眞正造成負擔的是「有一些不大懂事的朋友，才誠心來揩油」，「他們不帶糧票與米來，難道我們便不招待不成？」李劼人所謂「不大懂事的朋友」，指的是沙汀、巴金、張秀熟等人。李氏三個月內就請他們吃過三次飯，一次在餐廳用了 7 斤糧票。[122]請友人吃飯在此時成爲李劼人的負擔，甚至視爲被「揩油」的不樂之舉；每人每月有固定糧食配額，請人吃飯自己就要縮衣節食。體恤者去作客會自帶米糧，盡量減少主人負擔；不體恤者如沙汀等人，則讓李劼人自己負荷了。

此外，在餐館請客是更複雜的事，除要捨得出糧票與人民幣，因公家掌控所有物資，請客者須事先獲官方批文，餐館再據以向公家申請食材。1960 年 10 月 19 日，李劼人在芙蓉樓「包席」，請巴金、張秀熟、李宗林、沙汀等人吃飯，先由「市人委辦公廳正式開出通知，而後由餐館把菜單呈商業局核定配與材料」。李劼人知道，這種請客「非尋常人所能辦，而如我輩，也只能一年當中，只此一次而已」。[123]依當時情況論，這些「非尋常人」吃的亦非比尋常，以李劼人 1959 年 11 月 16 日請客的菜單爲例，端上桌的有燻魚、香酥烤鴨、鯽魚、夫妻肺片等。[124]李劼人雖感不滿，但現實上需依賴沙汀、李宗林保護，只能隱忍，仍得付費。不過，其實這也是李劼人比較習慣的場面。1962 年他

[121]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冊，頁 89-92。
[122]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168。
[123]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80。
[124]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58。

到北京開會，接連請在京工作的陳翔鶴吃飯，使職級較高的陳氏感到，「彷彿他的經濟力量老是超越於我似的」。[125]亦即，李氏內心也不易跟昔日風光道別，若依照毛澤東 1957 年的說法，即是：「現在知識份子有些不自覺，他們的牆角（經濟基礎）早已挖空了，舊的經濟基礎沒有了，但他們的頭腦還沒有變過來。」[126]李氏的日常生活表現，也成為中共評斷其為學習只是應付、頭腦依舊是資產階級的證明。

如毛所言，中共已將李劼人的經濟基礎徹底改變，唯一的依靠就是副市長的薪資，與依照職務而配予的生活照顧，「吃國家所有制的飯」。李劼人的副市長月薪 195.5 元，另外從嘉樂紙廠每季領取定息 127.8 元，平均下來每月收入約 238 元，較成都大學畢業生 30 至 40 元薪資高 7 倍左右，再加上歷年積蓄，擁有一定財力。1960 年，李劼人耗費近 11,000 元修繕私宅，手中至少還留下近 13,000 元。[127]但因李家每月開銷向來是 350 元上下，1961 年 2 月後因物價高漲，加上其他因素，導致每月開支都超出 500 元。[128]因入不敷出持續擴大，李氏判斷頂多再撐一年，「便須走入困境了」。[129]亦即，此正是其「生活之慮」。此刻，能救助李氏的僅有中共。

李劼人為吃飯用盡心力，吳宓也有類似感觸。他在 1961 年 3 月 13 日的日記中，寫下高級知識分子在當時的生活狀態：

> 按近數月來，「吃飯」遂成為人生最重要之事，一般人每日所思、所談、所計議、所注意奔赴者，惟此一事。……即我輩最受優待而確能飽食之高等知識分子，老教授，亦惟長日營營於此事：三餐早趨食堂，鵠立待時，魚貫取菜飯，既得則就桌而食，急吞大嚼，專心致志，無暇交言，且除一二人外，皆嘴唇上下合觸「翩翩」有聲，加以「齒決」，其人昔年或亦是少年美姿容而注重風度禮節者，今則一切盡忘，萬事

[125] 陳翔鶴，《陳翔鶴選集》，頁 405。
[12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 671-672。
[127]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91。
[128]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117。
[129]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187。

不顧，甘為伏櫪之群馬，芻食芻秣，但求腹實，而不計算其餘矣。嗚呼，此亦世變中之生活體驗，宓至老乃始遇之者也！[130]

由此可知，能否吃飽已成爲這些「最受優待而確能飽食之高等知識分子」的首要之務，而中共對統戰分子的照顧至爲關鍵，至於其他則無暇顧及。

李劼人在大饑荒時期之所以受到各項照顧，歸因於中共爲穩住政治與社會情勢，提出一連串的救急措施。毛澤東此時退居幕後，由劉少奇、周恩來出挽救危局。1959 年底至 1960 年 2 月，中國民主建國會與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召開全國大會，李維漢出席發表演講，強調只要資產階級願意合作並接受改造，中共保證照顧到底。劉少奇也在 1960 年 2 月 12 接見與會人士，他強調國家願意包生活照顧這一頭，「包一頭、包到底」，並強調「定息問題」可有彈性，「高薪不降，調職不減薪，減者補發」，以安定統戰對象之心。[131]劉少奇宣示政策後，國務院負責統戰工作的副秘書長齊燕銘在 7 月 30 日提出報告，建議爲照顧在京高級幹部與高級知識分子，實施副食品特需供應制度。[132]中共中央於 11 月 9 日批准，將適用範圍推廣至全國，又指示黨內地方各級領導，「實行副食品特需供應的照顧面，對黨外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可以稍寬，對黨內幹部必須從嚴。不宜不分黨內外，籠統地規定某一級以上的幹部一律享受特需供應。」中共堅持「內外有別」原則，一方面是爲「團結、教育和改造黨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顧他們一點」；另外，如對黨員幹部照顧「過寬」，或發生以權謀私、走後門等現象，不但「損害黨群關係」，也「勢必對幹部的思想發生腐蝕作用」，必須防患未然。故此，「全黨幹部必須以普通勞動者和人民勤務員的態度出現，與群眾同甘共苦，發揚吃苦在先、享受在後的共產主義風格，不斷同各種特權思想和特殊化傾向作鬥爭。」[133]可見，沙汀等黨員幹部指李劼人油，也是在嚴守黨紀之下的方便之舉。

130 吳宓，《吳宓日記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6），冊 5，頁 53-54。
13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頁 859-861。
132 關於特需供應制實施內容，參閱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冊，頁 292-294。
1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冊 13，頁 683-684。

中共中央確定特需供應與高價供應政策後，成都在 1961 年起提高糧、油、肉、蛋、糖等配額，其後擴及高級副食品、高級日用品等，價格比市場價高 4 到 5 倍，[134]因此加重了李劼人日常開支。1961 年 2 月，李氏經中共四川省統戰部轉告，得知劉少奇一年前的承諾，立即寫信給嘉樂紙廠負責人，請將 1960 年第四季定息「從速照發」。李氏表示，這一、兩年「文史研究館諸老人」，「死亡達五十餘人之眾」，希望能盡速得此續命金，「糧食過關，前途坦坦矣！」[135]主管財經的陳雲，在 1961 年 1 月 19 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提出「糕點問題」，認爲這攸關「緩和人心」，特別是對於像李劼人這類握有許多現款，但受限於固定配額，導致有錢無處用的人士，他建議在市場「網開一面」，以低價糕點、糖果維持搭配票券，高級品則定下高價，只收人民幣，讓資本家與工資高的民主黨派人士盡情消費，如此不但可以回收貨幣降低通膨，滿足他們物欲，也可以和緩對政權的不滿。[136]故此，四川省、市政府政協於是年 3 月設立星期六、日營業的小吃部，各種菜類價格昂貴，只針對特定人士發出餐券 200 張，僅可帶家眷使用。李氏祖孫三人 3 月 11 日就去光顧，共花費 30 多元，又買米花糖半斤 3 元，至於一斤高達 18 元的高級糖，則買不下手。李劼人事後覺得像「把大家都當作了暴發戶」。[137]即便如此，李氏仍無法克制口欲，依舊常去光顧。連不時仰賴李劼人救濟的魏時珍也當過「暴發戶」，並向李氏表示：「味頗不壞，雖份量不多，未能酣暢淋漓，然以近兩年之情況衡之，除在兄家飽餐一頓外，已可謂『得未曾有』矣！」[138]由此可見，陳雲從食物下手，緩和統戰人士的心與胃之餘，無須政治運動鬥爭，就足以使其自願拿錢給國家，可說是洞察資產階級的頭腦。

李劼人於餓殍相望之地，尚能花心思於食物上，也知到這全都是仰賴中共照顧。在 1960 年 11 月 2 日寫給女兒李眉的信中，他表示全家「都知道了受

---

134 成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成都市志 · 商業志》（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頁 18。
135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38。
1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 1905-199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下冊，頁 61-62。
137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106-107。
138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155。

了不少照顧，從前尚不免有些閒言閒語，現在沒有了，並且懂得了『爲人不自在，自在不爲人』的眞理。」[139]亦即，他已理解在新社會「爲人」要順服體制，如想「自在」，則無法「爲人」，就算曾有「閒言閒語」，現在也只有銘感五內，沒有絲毫離異之心。吳宓也有同樣的體悟，他在 1959 年 12 月 9 日寫給友人的信中，也表示：「宓力求『無我』，事事『從命』，表示願『聽黨的話』。」而中共對吳宓的回饋則是：「勞動寬免，高薪未減，小灶膳食，配給牛乳、白糖、煤油（補電燈）等皆是。」[140]亦即，中共藉由各種物質照顧，確實將他們「包下來、包到底」，令他們順服於體制。

在生活上照顧統戰分子之餘，中共也藉此審視他們的「頭腦」是否眞的變過來了。假設李劼人眞心依附黨，並親身體驗社會主義體制的優越性，應該致力於克己奉公，而非個人私利。但無論是公開言談，或私信內容，李氏都讓中共認爲始終沒變。例如，他向劉白羽表示努力政治學習，也致力修改舊作以適應無產階級文藝價值觀，但內心深處始終沒有奉馬列主義爲唯一圭臬。1962 年 8 月 1 日，距他離世尚有四個月，他寫信給外孫女稱讚她的作文，並給予指導意見，表示要用「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爺爺寫小說的手法，就是這樣。懂得這，便可以看爺爺的小說了」。[141]換言之，李劼人的頭腦並未全盤接受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依舊服膺「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長期監控其私人信件的中共幹部，看到這樣的內容，也會認爲他眞是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甚至要將不正確的思想傳遞給下一代。因此，中共內部評鑑認爲李劼人在 1957 年的公開檢討不深刻，1958 年交心運動是應付態度，也是其來有自。

中共成都市委統戰部在 1962 年 2 月對李劼人進行政治評鑑，認爲在大饑荒時期，「我們對他的生活又作了許多特殊照顧。但由於其牢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不願意接受教育改造。幾年來，李在各種場合與我〔黨〕進行劇

139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頁 81。
140 吳學昭整理、注釋、翻譯，《吳宓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 328。
141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集（增補本）：1950-1962》，頁 120。

烈鬥爭，……愛錢、好吃、發牢騷、洩怨氣是他的特點。」[142]亦即，中共已將他定位爲「敵人」，待適當時機進行清理是可預期的。此時整體社會經濟狀況才剛由大饑荒中復甦，中共尚無心力發動大規模政治運動，李劼人得以倖免於殘酷的政治鬥爭。

八個月後，李劼人於 1962 年 12 月 24 日過世。中共即便對他已有定見，他畢竟還是地方上具代表性的統戰對象，葬禮要符合政治規格，因此治喪委員會由李宗林擔任主委，沙汀爲副主委。遺族希望悼詞由沙汀執筆，中共高層也有此意，沙汀才敢答應，但基於政治顧慮，改由李氏好友、黨外人士林如稷在葬禮宣讀。沙汀清楚黨內高層對其跟李氏往來親暱不滿已久，例如 1957 年他與李劼人在全國人大聯名發文，讓毛澤東不以爲然，事後也被認爲不夠「左」而必須做自我檢討，又被批評「在黨內板起面孔，見了李劼人這些黨外人士卻談笑風生，親如手足」，故沙汀判斷他若是宣讀悼詞，「將會被認爲『右』得不可救藥」。[143]後續情勢發展證明沙汀的預感是對的。

沙汀撰寫悼詞時，清楚李劼人的歷史問題最爲關鍵，必須「對劼人解放後的政治思想問題做出正確估計」。[144]他與部屬經反覆討論完成草稿後，再送統戰部審核。沙汀叫人將定稿抄一份帶給林如稷，叮囑幾個注意事項，並給家屬過目，希望不出狀況。12 月 30 日，中共於市政府禮堂舉辦追悼會，此處爲明朝蜀王府舊址，當地人慣稱舊皇城，清朝稱明遠樓，爲舉行鄉試之處，具有特殊歷史文化意義，加上省長、中共成都市委書記出席，顯示李劼人備受政權禮遇。實際上，大多人清楚政治狀況，1957 年後對李劼人敬而遠之，原訂早上九點的追悼會，到場者寥寥無幾。主辦者將時間延後一小時，又動員市府辦公廳與中共成都市委統戰部全員參與，才使場面盛大隆重。[145]

---

142 轉引自雷兵，「編年」，頁 244。

143 李劼人 1957 年 6 月在四川省文聯會發言後，即與沙汀聯袂上京參加全國人大會議。沙汀在北上途中，對李劼人透露一些訊息，讓李氏知道政治風向變化。兩人因此在人大會議聯名發表反右言論，有亡羊補牢之意。在場的毛澤東，則有這兩人怎麼搞在一塊的反應，後來成爲沙汀犯錯誤的例證。沙汀，《雜記與回憶》，頁 65-66。

144 沙汀，《沙汀文集》（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卷 9，《日記》上，頁 437。

145 李劼人研究學會編，《李劼人研究》，頁 306。

追悼會正式舉行，沙汀事先雖已再三檢視悼詞，但林如稷唸悼詞時卻漏了「是有進步的」一句。沙汀事後發現，林氏拿到的稿子原本就漏了這一句，對此感到「不免歉然」。[146]「悼詞」代表中共對於統戰對象的政治定位，一字一句都具有特定意涵，必須字字斟酌。沙汀清楚，這個失誤或許會爲李氏遺族帶來難以預料的政治效應，在場稍有政治敏感度者，難免會聯想到中共對李劼人的結論，爲「不是有進步的」；光是漏念這一句，就足以讓人誤解中共對外公開宣示對李劼人的負面評價。[147]先不論外人如何想，至少中共辦理李氏後事時情理兼顧，沒有因他有政治錯誤而草率處理，反藉此顯示照顧統戰對象的用心。當時身爲副省長的鄧錫侯，對追悼會場面相當羨慕，向人表示：「呵吻，在明遠樓開追悼會，從來還沒有過呢！」[148]中共讓統戰人士感到受照顧的範圍，是像李劼人一樣，從生前到死後大小事，都被中共「包下來、包到底」，與體制合而爲一。

相較李劼人被包到底，其中共友人是否擁有較多「自在」空間？追悼會前一天，沙汀的領導李亞群指示他不准寫紀念李劼人的文章，顯示沙汀有先見之明。其後，中共四川省委批准沙汀找人撰寫追憶文的提議，李亞群又再重申沙汀不准寫，主因之一正是 1957 年聯名發文事件惹惱了毛澤東。沙汀因此感嘆：「跟有些人應該在政治思想上劃清界限」，「特別在嚴重的政治思想鬥爭應該如此，但卻不等於說，我同李劼人挨都不能挨了，問題在於是非分明！」[149]中共認爲沙汀「挨」李劼人過界，犯「右」的錯誤，以致不准他紀念李劼人。沙汀即便對黨的決定有微詞，在服從黨紀爲首要前提之下，依舊隱忍而不敢反

146 沙汀，《沙汀文集》，卷 9，《日記》上，頁 438。

147 「悼詞」的政治意義也可由統戰部幹部在梁漱溟死後，撰寫〈梁漱溟生平〉爲例。梁氏在 1988 年逝世，統戰部撰寫其生平簡略時，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描述他 1953 年頂撞毛澤東事件。最初原稿爲「受到不實事求是的批判」，中共中央書記處改成「受到批判」，引起遺族不滿。後來經過一番折衝，決定不談 1953 年事件，成爲各方能接受的結果。參見胡治安，《統戰秘辛：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頁 40-46。

148 沙汀，《雜記與回憶》，頁 66。

149 沙汀，《沙汀文集》，卷 9，《日記》下，頁 456-457；吳福輝編，《沙汀日記》（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頁 241、245、248。

應。由此可見，黨員沙汀比非黨員李劼人，更受體制約束，連私人友誼都必須先以「路線鬥爭」來考量，以免踏到紅線遭受清算。陳翔鶴爲李劼人寫了紀念文，這篇文章到文革時成爲「美化資產階級，爲資產階級塗脂抹粉」，有「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的文章和言行」的罪證，陳翔鶴因而遭受批鬥。[150]換言之，階級路線鬥爭的紅線不只是針對李劼人，對黨員也同樣適用，甚至更爲徹底。

五、結　論

本文以李劼人爲例，探討中共在 1949 年後將統戰對象納入體制而產生的新政治運作模式的具體狀態與變化。首先，李劼人與中共對於新政治體制運作有不同的看法。李劼人期望的是一種友好互動的合作關係，能夠有職有權，獨自負責，發揮所長。相對而言，中共的第一原則爲確保可以領導黨外人士，既團結又鬥爭則是具體方式。中共中央爲了確保統戰政策能夠貫徹，透過會議、指示，以及實際示範等方式，消除黨內幹部的各種情緒，接受與階級敵人共事，並讓統戰對象擁有較優渥的政治待遇。黨外人士能在政權中有一席之地，是中共有意而爲。中共在初期讓黨外人士有職有權，或者照顧生活所需，皆是基於先求團結，而不是基於平等互惠原則。當中共隨著現實情況演變，調整統戰政策，統戰對象的自立空間也隨著縮小，李劼人從有職有權走向有職無權的過程，正足以印證。

再者，中共並沒有因爲社會主義改造成功，順勢將統戰對象排除於體制之外。統戰對象即便是政治花瓶，依然可在體制內擁有一席之地，統戰分子的政治身分、政治待遇與物質供應，使這群人在社會上處於優勢地位。中共一方面讓統戰對象成爲依附者；反之，因爲體制上的保障，又賦予統戰對象得以自立的條件。正如李劼人，雖然在政治有職無權，甚至成爲政治監控對象，但由於沒有被公開宣示爲階級敵人，依然能以副市長的政治級別，享受體制配給的各項待遇，藉此度過大饑荒時期，並可照顧家人親友。李劼人懂得利用制度賦予

150 陳開第，〈陳翔鶴與李劼人〉，《新文學史料》，1992 年第 2 期，頁 29。

的合法地位，爭取各式各樣的照顧，而中共也依循政策走向與制度規定回應其要求。亦即，分析中共政治運作，政治人物的作用力固然重要，體制規範也具有一定作用，兩者必須兼論而不可偏廢。

此外，從李劼人的例子，可以發現除暴力、鎮壓之外，中共以資源照顧支持者，使其與體制的聯繫更加緊密，亦是維持政權穩定的重要面向之一。從李劼人的例子可見，即便是強調專政的中共，也不是純粹依靠暴力治國。毛澤東雖然強調「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但在「暴烈行動」之外，亦有「革命也要請客吃飯」，「包下來、包到底」的一面，「糖果」、「高級糕點」是必要的政治潤滑劑，能夠緩和統戰人士的情緒，對穩定政權相當有幫助。換言之，這是一個軟硬兼施的治理方式。之所以有用，一方面與將資源集中國家管理的集體所有制息息相關；另外，則是投其所好，觸發個人主動向體制靠攏的積極性，進而養成長期依賴性，使個人與體制密不可分。中共可以決定物資的供應與分配，體制內的人可以受到更多照顧，至於敵人只能承受暴烈打擊。

最後，李劼人終究成為體制的依附者，也清楚沒有體制沒辦法存活，但這不表示他身心靈已全然順從中共，徹頭徹尾轉化成無產階級。他在政治上順從，但維持自己的各項生活習慣，甚至在文藝創作上也堅持自己的喜好，保持心靈的自立。這也正是毛澤東所言，資產階級的舊頭腦並沒有因為經濟基礎轉變而跟著變換。李劼人這些人提醒著中共，舊頭腦在新的經濟基礎上可以繼續運作的可能性。換言之，統戰對象即便完全依附於體制，中共在沒有改變本質上視其為階級敵人的前提下，依舊對他們充滿敵意，擔心他們會反撲，資產階級思想會侵蝕中共黨人的心靈。統戰對象之所以能夠長期處於體制之內，主要是因為中共現實政治上的需要，所以李劼人生前雖已被政治監控，依舊可以享有生榮死哀的政治禮遇。一旦當局決心徹底解決資產階級在黨內外造成的問題，即便如吳宓宣稱「無我」、「聽黨的話」，在文革時也難逃被整肅之命運。故此，「階級」實為毛澤東時代的核心概念，這也是李劼人的故事，可供我們進一步深思之處。

徵引書目

一、檔案

〈嘉樂製紙廠公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經濟部檔案》，館藏號 18-23-01-17-08002。

薄一波記錄，〈少奇同志在政協會討論土地改革法後的結論〉，四川省檔案館藏，「川西區黨委：（1950-1952），毛主席、劉少奇、張際春同志及中央、西南局、區黨委關於土改工作的指示」，建西 1-001-164。

二、專著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重慶市委員會編，《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卷 6，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共文獻出版社，200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冊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 1905-1995》，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 1921-1949》，卷 1，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商業卷，1958-1965》，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青年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 4，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王光美，《我與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王東杰，《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北京：三聯書店，2005。

王朝本主編，《共和國時代的吳宓：以《吳宓日記續編》爲中心》，北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

王嘉陵主編，《李劼人晚年書信集（增補本）：1950-1962》，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

王綠萍編著，《四川報刊五十年集成（1897-1949）》，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1。

付金艷，《實業家李劼人檔案揭密》，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

四川卷編輯組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四川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川省志・人物志》，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

成都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李劼人研究學會編，《李劼人研究：2007》，成都：巴蜀書社，2008。

成都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李劼人研究學會編，《李劼人研究：2011》，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1。

成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成都市志．商業志》，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
吳宓，《吳宓日記續編》，冊 5，北京：三聯書店，冊 5，2006。
吳福輝編，《沙汀日記》，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吳學昭整理、注釋、翻譯，《吳宓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11。
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李士文，《李劼人的生平和創作》，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李劼人，《李劼人全集》，卷 1、7、10，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1。
李劼人，《李劼人選集》，卷 1，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0。
李劼人，《李劼人選集》，卷 5，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
李劼人研究學會、李劼人故居文管所編，《李劼人的人品和文品》，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李劼人研究學會編，《李劼人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增訂本）》，香港：明報月刊社，1982。
沙汀，《沙汀文集》，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卷 9，《日記》，上、下，2017。
沙汀，《雜記與回憶》，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
胡治安，《統戰秘辛：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
孫震，《楙園隨筆》，臺北：川康渝文物館，1983。
徐慶全，《革命吞噬它的兒女：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張仁善，《1949 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一），北京：三聯書店，1979。
悼念魏時珍先生紀念文集編輯組，《魏時珍先生紀念文集》，成都：編者自印，1993。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修訂版）》，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15。
陳明遠，《知識份子與人民幣時代》，上海：文匯出版社，2005。
陳翔鶴，《陳翔鶴選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冊 1，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9。
劉航琛口述，章君穀筆記，《戎幕半生》，臺北：川康渝文物館，1983。
鮮于浩、田永秀，《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中的四川青年》，成都：巴蜀書社，2006。
Dikötter, Frank.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 Co., 2010.
Dikötter, Frank.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1957*.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3.
Kataoka, Tetsuy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Ng , Kenny Kwok-kwan. *The Lost Geopoetic Horizon of Li Jieren: The Crisis of Writing Chengdu in Revolutionary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2015.

P. Van Slyke, Lyman.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三、論文及專文

余敏玲，〈從無知到有感：程硯秋與中國共產黨〉，《新史學》，卷 27 期 3，2016 年 9 月，頁 123-176。

何崧齡，〈嘉樂紙廠之過去與將來〉，《四川經濟月刊》，卷 1 期 6，1934 年 6 月，頁 6-10。

吳仁明，〈抗戰時期四川民營工業興衰及其與政府關係研究〉，《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2 期，頁 91-97。

吳晉航、鄧漢祥、何北衡，〈四川軍閥的防區制派系和長期混戰〉，收入四川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集粹》，卷 1，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頁 511-535。

陳開第，〈陳翔鶴與李劼人〉，《新文學史料》，1992 年第 2 期，頁 26-30。

陳綱祖，〈陳開沚與裨農絲廠〉，《三台文史資料選輯》，輯 1，1984 年 9 月，頁 37-43。

曾智中，〈實業家李劼人史料一束〉，《蜀學》，輯 8，成剳：巴蜀書社，2014，頁 273-290。

雷兵，〈「改行的作家」：市長李劼人角色認同的困窘，1950-1962〉，成都：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論文，2004。

雷兵，〈「改行的作家」：市長李劼人角色認同的困窘（1950-1962）〉，《歷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頁 20-33。

雷兵，〈李劼人研究的現狀與問題〉，《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1 期，頁 54-57。

楊繼珊，〈調查嘉樂紙廠報告書〉，《四川善後督辦公署土產改進委員會月刊》，卷 1 期 2，1934 年 8 月，頁 17-18。

鄭會欣，〈對「官僚資本」的再認識〉，《民國檔案》，2003 年第 4 期，頁 104-111。

蔣林欣、張歎鳳，〈「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英語世界的李劼人研究成果與現象〉，《中外文化與文論》，2013 年第 3 期，頁 123-139。

羅曉紅，〈李井泉四川調糧眞相：代價無奈 大愛無疆〉，《黨史文苑》，2011 年第 11 期，頁 23-27。

C. Strauss, Julia. "Paternalist Terror: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53."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4:1 (January 2002), pp. 80-105.

四、網路資源

王嘉陵，〈錦城浮雲見玉壘：李劼人晚年書信二三事（上）〉，「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riter. com.cn/n1/2018/0330/c404063-29899042.html （2018 年 4 月 26 檢索）。

Autonomy and Attachment: The Case of the United Front Target Li Jieren

Wang Chaojan*

Abstract

The united front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ached a new stag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CP and the bourgeois class was apparently transformed from collaboration in order to fight against the Nationalist regime to apparent unity, which was actually CCP dictatorship. For the CCP, the bourgeois class was its ideological enemy, but nonetheless the CCP had to include it in the new political system to consolidate the regime in the founding of the socialist state. Therefore, the primary goal of the CCP was to subjugate the bourgeois class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CP. As for social elites, which were considere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bourgeoisie, they entered the CCP's political regime without fully comprehending its ideology and saw themselves as collaborators of the CCP with a certain level of autonomy. Therefore,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both unifying and criticizing, the CCP employed a practical unification policy on the following terms: on the one hand, it provided political and other benefits to the united front target elites through political rights and material shelter,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a series of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thought education, it tried to reform them into socialist new men and took away their independence to attach them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By focusing the case of Li Jiere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new political model of the post-1949 period and the various stages through which it evolved.

Key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ited Front, Li Jieren, Chengdu, Sichuan

*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